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

金冲及

内容提要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基本上没有在山东建立过一支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更谈不上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在短短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共建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无论在总人口、党员、军队数量,还是歼敌人数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其他抗日根据地。为什么抗战期间在山东发展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成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军的最大主力部队,如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三十八军、二十七军?本文系统梳理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的独特历程,力图回答这一问题。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 80 周年之际,回顾这一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前人的业绩,更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 山东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一五师 山东纵队 罗荣桓 黎玉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如果把它同许多其他根据地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山东抗日根据地有着几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战前,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处境十分艰难。当时工农红军已经建立起三个方面军和一个军团,创立过十多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在山东却没有建立起一支红军和任何政权,更谈不上形成革命根据地,而且省委在 1933 年两次因叛徒出卖遭受大破坏,两年内同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中央无法知道党组织在山东的活动情况。

但到八年抗战结束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情景: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所属山东诸县,人口共 3500 万,占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军队有 33 万人,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歼敌 60 余万人,占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 30 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① 在抗日战争这不长的八年中,发生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在各抗日根据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战后,山东八路军主力 63000 人横渡渤海,进军东北,形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骨干力量;在关内,山东成为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东线主战场,八路军留下的山东野战军同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组成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震动全国的晋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1947 年 7 月的小河会议上,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所做的《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报告中,谈到“我军各区成绩次第”时列为第一位的是“华东”^②,而其中绝大多数

^①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 卷,“前言”,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页。

^② 周恩来:《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2、233 页。

战绩是在山东战场取得的。在人民解放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三十八军、二十七军,都是在山东发展起来的。这不能不说创造了奇迹。

第二,抗战期间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一般是经过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进入这个地区,消灭敌人,发动并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来实现的。山东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它是先由山东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的决定,得到八路军的帮助,迅速发动群众,趁入侵的日本侵略军正大举向南进军而在山东立足未稳、国民党军队迅速撤退、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时机,毅然地独立在敌人背后发动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和人民政权,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接着,八路军总部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一五师主力和一二九师一部进入鲁西北和冀鲁边区。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相互支持和支持、共同作战、逐渐融合的格局。到1943年,建立新的山东军区,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个过程,在其他抗日根据地是少见的。

第三,抗战八年中,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层变动较少。山东地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有黎玉、郭洪涛、朱瑞、罗荣桓(徐向前也曾有一年在山东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这中间,个人的情况又有所区别,在工作中难免有起伏和波折。到罗荣桓担任主要负责人、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这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为什么在短短八年中山东的局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有哪些可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后人进行认真的考察和思考。

抗日前夜山东党组织的重建

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山东开始得很早。五四时期,王尽美、邓恩铭便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中共一大召开时,他们两人作为山东的代表出席大会。“自1922年起,山东共产党和青年团逐渐扩大了”,“山东革命运动也迅速开展了,主要是青运和工运”。^①

但当时的山东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野蛮统治下,在连绵不绝的南北战争中地处北洋军历次大举南下的要冲。北伐战争结束后,1930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不下140万人,战争主要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持续达半年之久。以后,山东由拥兵10万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控制,对共产党和群众革命活动进行严厉镇压。“更利用党内自首叛变分子组织捕共队”^②,专门从事破坏工作。而山东党组织却盲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不考虑敌我力量悬殊,盲目发动暴动,多次使党组织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毁于一旦,省委组织屡遭破坏。

最严重的是1933年,山东省委连续遭到两次大破坏。2月“由于团省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后叛变,使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部长向明、团省委书记孙善帅及省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员等29人被捕,济南及外地的党团组织有的也遭到破坏”。7月,山东临时省委又遭破坏。“这次,由于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的投敌叛变,党组织受的损失最大,有300余名党员和党关系密切的群众被捕”。“青岛、泰安、沂水、寿光、益都、潍县等地党的组织均遭破坏”。^③

^① 贾石亭:《党创立时期山东地区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页。

^② 《中共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1931年2月),《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46页。

^③ 赵健民:《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恢复关系的前后》,《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396页。

这样,从1933年到1935年整整两年间,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和党中央一直失去联系。各地幸存的党员和若干基层组织,因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难以开展工作。

为什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一直没有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工农红军?原因就在这里。

尽管如此,分散在山东各处的一些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省委被破坏、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没有悲观失望,依然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且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全省有组织联系的党团员已达500多人。他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同北方局和中央的联系。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处在长征历程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中央局又屡遭严重的以至毁灭性的破坏。这种寻找,一时难以取得结果。北方局代表曾委托人1934年秋到胶东建立特委组织,不久又遭到破坏。^①

直到1935年冬,由失散的党员和地方党组织自动集合并组织起来的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的代理书记、原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健民通过可靠关系,终于在冀鲁边境的濮县找到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兼任直东特委书记和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的黎玉,才接上关系。赵健民回忆:“黎玉同志讲道:北方局对于山东党失掉联系,也很着急,多方面派人联系。现在联系上了,这就好了。”又说:“山东省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后,你们能独立地坚持工作,发展恢复党的组织,现在能有五百多个党团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独立地进行党的工作,这是难能可贵的。”^②黎玉向他说明了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山东不少党员原来不很清楚的,思想上要转这个弯子。赵健民还报告了他们已取得联系的党组织和失散党员的情况。黎玉要赵健民写成书面材料,由他转送北方局。

1936年初,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到邯郸传达北方局的决定。黎玉回忆高文华所说的话:“山东有好几年没有省委组织了,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决定派我(指黎玉——引者注)到山东去恢复与重建山东省委组织部,并由我担任省委书记,其他负责人由我去后选定,工作由我酌情办理等等。”^③

黎玉到济南时,叛徒、特务等仍在到处搜寻共产党人的踪迹,局势依然十分险恶。5月1日,新的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重建省委的第一次会议,确定省委组织部部长由赵健民担任,宣传部部长由济南高中支部书记林浩担任,他们都是山东本地保存下来的年轻党员干部。同时,也挑选了一些可靠的工作人员,建立指挥系统,以便沟通上下,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新省委重建后,放在面前最迫切的是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没有这一条,谈不上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这以前,中共山东省委虽已遭受破坏,但在济南等地仍保存着许多基层党支部。“此时,各地党组织的同志深感长期失去上级党领导的痛苦和工作上的困难,亦在千方百计与省委接头,以取得省委的领导和指示”。^④

新省委以很大的努力来建立和调整各地区的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项极为急迫又必须特别谨慎的工作。工作是面对全省的,而对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在事前做到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又可能重蹈以往党组织遭到全盘破坏的覆辙。新省委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一年多时间里,除健全济南市委外,还建立起鲁西北地区特委,调整莱芜县委,建立鲁东工委,建立淄

① 《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常子健的履历》(1934年10月2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445页。

② 赵健民:《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恢复关系的前后》,《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400、401页。

③ 《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

④ 景晓村:《巡视寿光的回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6卷,第364页。

博矿区特支，建立鲁北地区特支，恢复胶东特委。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全省与省委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已近 2000 人。这是有力地推进全省各项工作的必要前提。

另一项任务是把积极推动抗日救国活动作为重建起来的山东全党的第一位任务。这是全国政治局势急剧变化的客观局势决定的。1935 年下半年起，日本大大加快了侵华步伐，他们把重点放在华北，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割裂出去，成为“满洲国第二”，日本军队在华北公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平津一夕数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一二·九”为代表的爱国学生运动席卷全国。各界的救国会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工农红军胜利地结束长征，到达陕北。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国民党当局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开始决心抗日。

身处危城的平津学生大批南下，来到山东。当时兼任济南市委书记的林浩回忆道：“平津流亡学生有几百人到了山东，大部分成为我们的骨干。通过教员、学生做工人、农民的工作，为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打下了基础。”^①山东省委以很大力量在各地组织并扩大学生抗日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人抗日救国会、小学教师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随后，又有抗敌自卫团、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等组织。这些救国团体的成立和开展的活动，一举冲破山东社会原来的沉闷政治空气，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是完全正确的，是民众的普遍愿望，深深博得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能以比较合法的方式开展活动，团结的社会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在活动中，又可以发现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并发展新的党员，壮大党的力量。这种组织形式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救国力量的发展，但农民组织的救国会并不多。

1937 年 4 月间，北方局通知黎玉去延安参加苏区代表会和白区代表会，听取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回山东后在党内作了传达，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没有山东省委的重建和抗战前夜这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作为准备，以后抗日游击战争能在山东那样快地大规模发展起来和山东纵队这支重要武装能迅速建立，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武装起义和山东纵队的成立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

局势发展得很快。7 月 29、30 日，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日军向华北大举增兵，首当其冲的是山西和山东。他们从平绥铁路转同蒲铁路南下，又从平汉铁路转正太铁路西进，两路夹击山西省会太原。同时又以两个多师团主力 3 万多人沿津浦铁路南下，直扑山东省会济南。山东局势日趋危急。

7 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曾任红一方面军警卫师政委、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的红军将领张经武来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协助下，张经武与韩复榘多次会谈，韩终于同意释放政治犯。9 月至 11 月，近 400 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陆续出狱，他们先后被派往山东各地，成为领导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的大批骨干

^① 林浩：《关于山东党组织恢复时期的情况》，《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5 卷，第 435 页。

力量”。^①

为准备抗日武装起义，山东省委最缺少的是军事干部。9月中旬，黎玉到山西太原参加刘少奇、杨尚昆、彭真等召开的北方局所属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配合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他向杨尚昆、彭真要求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到山东担任军事工作。那时，八路军才刚刚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战略部署尚未展开，平型关战役还未打响，不可能抽派很多部队到山东，但随后仍派了廖容标、洪涛、赵杰（原红四方面军政委，在抗大学习后被派到北方局准备参加敌后斗争）等几个红军干部到山东来。

10月初，日军进入鲁北，占领德州、平原、禹城等地，山东局势更加严重。11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报告鲁北、鲁西、鲁西北、泰安和莱芜等地的情况，强调在当时受日军威胁最大的鲁北要“以‘一切工作围绕在游击战争的周围’，独立的发动与准备及合法利用的发动与准备领导游击战争”。同时指出还存在“党的基础薄弱”“群众组织还是不广泛，且亦松懈”“干部缺大多新干部，亦不敷应用”等缺陷，并且强调：“尚需要大批之军事干部，虽派两个红干，再有10余还可安插，希速派来。”^②

战局恶化得很快。12月中旬，南京沦陷的同时，日本军队5万多人分两路渡过黄河，27日占领济南，韩复榘挟10万大军不战而退，听任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境内长驱直入。“各县县长也大都弃职开小差，逃之夭夭。抗战无人领导，治安无人维持，汉奸猖獗，土匪兴起，社会秩序紊乱”。^③面对日军到处烧杀奸淫，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只有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才是唯一的生路。“当时真是登高一呼，群相响应”。^④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士，正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为了祖国的生存，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和牺牲，挺身而出，带领民众誓死抗争。爱国将领、原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也通电全国，决心留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誓不南渡黄河。

抗日武装起义不可能等各种条件都准备就绪后再发动。12月28日，也就是济南失陷的第二天，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泰安以南30多里的徂徕山发动武装起义。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山东省委领导直接领导的第一场武装起义的地点？那有几个原因：第一，这里地势险要。徂徕山位于泰安县以南，北靠泰山，南接蒙山山区，东连莲花山、沂蒙山区，西通泰西大峰山，四周群山环绕成为天然的屏障。正长驱南下的日军一时还难以顾及。第二，它处于山东的腹心地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便于和全省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第三，这一地区的党组织经过整顿、恢复，工作基础较好。

要发动武装起义，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准备参加起义的党员和群众几乎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或青年农民。他们满腔热情，但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和训练，连基本的军事知识也没有，又怎样发动武装起义呢？

此前两个月，山东省委已派刚营救出狱的地下党员程照轩（曲阜二中学生）、侯德才和北方局派来的军事干部赵杰三人到泰安六区成立区委，开展工作。程照轩是当地人，就以他家作为活动基点，利用社会关系走家串户做工作。

他们商定了一个初步行动计划：“第一，首先通过程照轩所熟知的抗日积极分子，利用其社会

①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6页。

②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报告》（193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1页。

③ 郭洪涛：《山东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总结》，《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146页。

④ 肖华：《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编：《忆沂蒙》（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关系走家串户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群众参加抗日工作。先以秘密方式进行,如发展顺利再转入公开方式。第二,在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新党员,适时建立党的支部。第三,抓紧做程子元的工作。第四,发动群众及各界人士等,捐武器,同时组织武装队伍。”^①

当地贫苦百姓听到共产党来领导抗日,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程照轩等利用讲演、学校师生演剧、贴标语、编唱抗日歌曲等方式广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第六区区长兼民团队长程子元是程照轩的堂兄,重义气,有民族自尊心,也表示:“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你们共产党放心,我不抗日就不是我娘养的。”^②当地民众捐出盐窖存放的六十多支枪,还有其他钢枪、土枪一百多支,一百多名青壮年要求参加抗日队伍。事实表明:在当地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符合群众的强烈要求,有着可靠的群众基础。

1938 年 1 月 1 日,在徂徕山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山东省委在会上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由红军军事干部洪涛、赵杰为正副司令员(洪涛不久在战斗中牺牲),黎玉为政治委员,林浩为政治部主任。黎玉在会上讲了山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强调了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

一支由土生土长的山东子弟组成的八路军抗日武装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山东人民的抗日战争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那时,日本侵略军在山东正准备发动徐州会战。他们兵力有限,在地域广阔的山东,一时没有足够力量对付被他们看不起的抗日游击队。他们刚占领泰安县城,情况不明,短时间内也不敢轻率地向山区出动。第四支队抓紧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强化政治和军事教育训练,从事部队建设。

中共中央对这支部队十分重视,在 1938 年 1 月 15 日专门向山东省委发出指示:“济南失守后,日寇继续南下,津浦线济南徐州间有完全被日寇占领之可能,因此山东广大地区有沦为被日寇占领区域之危险。目前省委工作的布置,应注意即使山东完全变为日寇占领区域,还能使我们的党坚持在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保存党的力量,坚持与日寇进行长期的斗争。”^③这就把山东抗日根据地下一步将面对的形势和工作方向说清楚了。

徂徕山起义后,把起义烽火延烧到全省各地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敌人的矛头主要向南,控制中心城市、重要港口以及铁路交通线,对我山东腹地广大平原还没有开始大的‘扫荡’。”^④1 月中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下山,开展游击战争,多次对留在山东后方、立足未稳的日军开展伏击战,对日军交通线进行破袭战,游击队和群众影响不断扩大。在省委部署下,省内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泰西、滨海、鲁南、湖西等起义,到 4 月间,在全省已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其中,如胶东特委书记理琪(起义不久后牺牲)集合 17 个人、两支枪,在文登县天福山起义,2 月间队伍扩大到 200 多人,成立军政委员会,攻克福山、蓬莱、黄县、掖县等县城,部队扩大到 7000 人。省委派姚仲明、廖容标等到长山县中学开办游击训练班,以后组织武装队伍,发动黑铁山起义,攻克邹平、淄川县城,部队发展到 6000 余人。在有些地方,还初步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起义,大大振奋人心,说明在山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大有可为的,并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在津浦铁路南段正面战场的作战。

① 赵杰:《到敌人后方去》,《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7 卷,第 565 页。

② 林浩、赵杰:《回忆徂徕山起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6 卷,第 285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等问题给山东省委的指示》(1938 年 1 月 15 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7 卷,第 16 页。

④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 年 6 月 2 日、1960 年 12 月 12 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81 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中写道：“中国军在各方面被击溃后，遂全面地展开游击战以搅乱日军后方。尤其共产军的游击战甚为巧妙，其力量亦日益增强，且扩大至广泛的地区。”“如此之游击行动，实施于日军警戒网的空隙，巧妙的出没无常。日本军占领之地区较其兵力过于广大，无法守备全地区。因此一面守备主要的政略、战略上要点及主要后方交通线尤其铁路线，一面实施广范围的对游击部队的讨伐”。^① 其实，他们当时正全力准备和进行徐州会战，在山东只能顾到一些点和线，根本谈不上在山东“实施广范围的对游击部队的讨伐”。

这是山东局势发展十分有利的一面，但事情还有令人焦虑的另外一面。三四月间，台儿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历时半个多月。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由于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歼灭日军近万人，取得抗战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举国为之欢腾。这次战役后，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军队主力集中在徐州地区，攻占徐州不仅可以把华中和华北连结起来，而且准备有力地进攻集结在武汉等地的中国军队主力，因而制定《徐州附近地区指导要领案》，决定由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中主力南北夹击徐州。一旦徐州沦陷，便会像中共中央1月指示所指出的：山东将全部沦为日本占领地区，成为敌后战场，并经受日本侵略军的不断“扫荡”。

山东战局，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山东省委清醒地认识这种大变局中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黎玉回忆道：“由于起义部队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加之民主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困难。怎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起义部队之间的协调指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派我赴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工作，以取得中央的指导和帮助。还觉得办这件事，宜早不宜迟，乘着徐州尚未失守、铁路交通方便时，我带上我们第四支队油印的军用护照，盖上大印……用我们的护照坐上军用列车向西行，经西安在4月初顺利到达延安。”^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山东，2月15日曾致电朱德等：“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他们考虑：“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③ 这在当时只是一种设想，后来并没有实行，但也可看到他们已考虑到山东的问题。

黎玉到延安后，毛泽东见了他，并在4月5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纵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二百人、八百枝枪，除决定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④ 他确定先派郭洪涛到山东工作。郭洪涛那时正担任着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和他同去山东的干部有段君毅、霍士廉、王彬等约50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接见了这批干部，对他们说：“我们党的方针，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山区的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平原游击战争能否坚持，还没有经验，需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87、88页。

② 《黎玉回忆录》，第149、150页。

③ 《毛泽东、滕代远关于一一五师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8页。

④ 《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8年4月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24页。

要看一看。”郭洪涛又去看了刘少奇，他回忆道：“刘少奇同志对我讲，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共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式很好，要我转告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同志，坚持这个方向；并指示我到山东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另外，他还谈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离河南省太远，我去后，即归山东省委领导。”^①

毛泽东最初考虑派罗炳辉去山东负责军事工作。罗炳辉是中央红军中的著名将领，曾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战功显赫。“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在武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②黎玉回忆毛泽东同他谈调干部去山东时说：“毛主席又要我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告诉我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罗炳辉同志到山东工作，理由是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红军将领，他到了山东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1938年6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大力支持。由于当时做统战工作的罗炳辉同志，一时不能离开。所以党中央又决定改派张经武、江华、吴克华、胡奇才、徐斌洲、吴仲廉等同志以及抗大、陕北公学一批毕业学员共近200人支援山东。8月间，我和张经武同志、江华同志带领这批干部返回山东敌后。从此，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山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③张经武在抗战开始时，曾改用张金吾的名字，到山东负责同韩复榘部的联络工作，对当地情况是有了解的。^④

两批有经验的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从延安来到山东敌后，使部队的领导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是山东原有干部热切期待的。山东党和部队的机构相应地作了调整。

这时，山东局势正发生重大变化。5月19日，徐州失守，山东全部沦为敌后。20日，中共中央派往山东的负责人郭洪涛率领50多名干部到达泰安南上庄的山东省委驻地。郭洪涛回忆：“根据中央决定，重组山东省委，我和林浩同志为常委（黎玉当时仍在延安，未回到山东——引者注），由我担任书记。”^⑤21日，省委召开干部会议，由郭洪涛传达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做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月下旬，中共中央鉴于徐州失守和八路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的部署，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省委，仍由郭洪涛为书记。

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已发展到4万多人。各路起义部队原来名称不一，有用“抗日联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团”“抗日游击队”等的，也有直接用八路军番号的。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郭洪涛：“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游击队即可，其余在我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⑥6月8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说得更加明确：“山东四支队原用八路[军]名义，我友相处甚好，后改用别的名义，弄得大家怀疑，故同意洪涛提议仍恢复八路军名义。我意直鲁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邻近友党友军又甚欢迎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因此等地方国民党均将控制，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支配，甚至通令解散，八路无权过问；用八路名义则无此弊，但以不致引起误会与摩擦为

① 《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② 罗鲁安主编：《罗炳辉文集》，“前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③ 《黎玉回忆录》，第150页。

④ 《张金吾关于山东情形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1月2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2、13页。

⑤ 《郭洪涛回忆录》，第130页。

⑥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山东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队番号致郭洪涛电》（1938年6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32页。

原则。”^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首先恢复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番号,其他部队也陆续改用八路军的番号。

11月,张经武、黎玉率领干部和抗大、陕北公学学员约二百人从延安到达山东。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组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为书记,张经武、黎玉两人为委员。山东分局中,由延安派来的干部处于主导地位,以加强中共中央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

12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随郭洪涛到山东的王彬任参谋长。山东纵队这四个核心人物中三个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之间相处很好。纵队下辖9个支队及陇海游击队、直属四团、纵队特务团、临郯独立团。纵队所属基干部队共2.45万人,所属地方独立营团共1万人。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后,1938年6月间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是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毛泽东审查了这个计划,并电示:“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去做。”^②

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的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队兵团。

山东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它有十分突出的优点,但一开始也有难以避免的某些弱点。新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对它有很深刻而生动的记录。他是出身井冈山的红军老战士,来到这里刚组建一年多的年轻队伍,又担任政治部主任,自然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感受。他的记录虽然长一点,为了更真切地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仍值得将它摘要抄录在这里:

从总体上看,这些部队有很高的抗日热情,党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建立的时间很短,来不及整顿训练,所以存在一些明显的弱点,主要是:第一,部队起义初期,数量很大,号称八万,部队成员主要是农民,其次是平津流亡的和本地的大、中学生,也有开明士绅,还有一部分是无业游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反正的伪军、土匪等等,成份[分]极为复杂……第二,政治工作薄弱,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有些游击队组织很松散,几个村子的人凑在一起,有事就集中,无事就回家。有些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都参加了部队,有父子兵、兄弟兵、叔侄兵。他们昨天还是农民,刚扔下锄头,就拿起枪杆子,还没有听从命令、服从组织纪律的习惯。有些人参加部队就是为了保家保乡,家庭观念和地域观念比较浓厚,不愿调离自己的地区……第三,从整体上讲,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比较差,战斗力比较弱……在军事上,由于多数人没有拿过枪杆子,没有经历过战争,许多人连基本的军事技术也不知道,打仗只凭热情和勇气。部队的装备也很差,拿刀枪棍棒的都有。文化上,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也有中学、师范等小知识分子,而大多数农民战士则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③

刚从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走出来的山东党组织,在武装精良的日本军队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能够毅然高举义旗,组成这样一支遍及全省、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抗日的武装队伍,还建立了一些

^① 《毛泽东关于直鲁等处属我领导之游击队应以八路军命名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6月8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33页。

^② 王彬:《八路军山东纵队组建前后追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7卷,第326页。

^③ 《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抗日根据地,实在太不容易。因为部队是短期内通过起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员和战斗骨干的数量比较少,初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并不奇怪,如果没有这些状况,或者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消除,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山东纵队领导抱着冷静的态度,坚持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对部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训,基本要求是把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走上正轨。整训中,着重进行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爱护民众、听从指挥的教育,突出抓了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也进行军事训练,使部队从原来比较松散的状态一下子严格起来。

整训后,山东纵队将所属部队整编为七个支队,还有一个特务团和直辖四团,各部队基本配齐了军事和政治干部,改进了管理,严格了纪律,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部队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向正规化建设跨出了重要一步。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

进入1939年,从山东的抗日斗争来说,最重要的变化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年3月初开始大举挺进山东,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一一五师从晋西南东进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从山地游击战到进入平原作战,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中央为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反复考虑。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指出,红军的作战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① 25日,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原来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而成,进入山西前线后首先取得平型关大捷,大大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以后,一一五师实行分兵:该师一部约3000人由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依托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三四四旅划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三四三旅的两个团,加上新建的一个补充团由代师长陈光和继任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率领,创立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这是八路军三个师当时在山西全盘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1938年4月,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从延安致电八路军前方将领,做出新的部署:“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②

但这个部署除河北外还处在观察和准备阶段。5月,毛泽东致电前方将领:“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提,也不应向李白程(李宗仁、白崇禧、程潜)提,只是自己预作准备,那时刘、林两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山东方面已发展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越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但需要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③ 可见山东省委这次去延安汇报,引起中共中央很大的关注。由于考虑到武汉保卫战刚刚开始,成为全国时局的焦点,八路军主力如在此时大举进入山东,容易引起误解,尚不适宜,但对“整个新的部署”已

^①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②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③ 《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5页。

需“预作准备”，也考虑到可“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这为第一一五师入鲁已有伏笔。

7月间，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组成一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于9月27日，越过津浦路，跨过冀鲁边的边缘——乐陵县，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揭开了挺进山东的序幕”。^①

10月下旬，武汉失守后，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作整个新的部署了。

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提出“新的部署”：“我们考虑结果，以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陈旅（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他们原来所在的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怎么办？电报说：“晋西南地区暂留陈旅之补充团并集中各游击队编成一团交陈士榘指挥，尔后，可从一二九师调一支队接防。”电报接着说：“陈罗开东时拟分布与新老黄河^②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东西、胶济南北在内。”^③

决定一一五师开入山东，是一个大决断、大动作。

按照军委部署，罗荣桓、陈光率部在12月20日从晋西灵石县出发东进。“从晋西到山东约有3000里，途中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翻越了被戏称为雪山的绵山，还配合一二九师粉碎了敌人对山西辽县的进攻。这次进军曾被人称为‘小长征’”。^④1939年3月初进入山东。14日，一一五师在东平县同中共泰西地委（书记为段君毅）和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那时，领导鲁西北、泰西、运西等地工作的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也赶往东平。3月下旬，罗荣桓越过津浦铁路到达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会见郭洪涛、张经武、黎玉、江华等。一一五师仍留驻在鲁西地区。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大大加强了山东抗日武装力量。为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于1939年3月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建议派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去山东，以统一并加强对山东党政军的领导。

这以前，徐向前从1938年4月下旬起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左纵队（路东纵队）在冀南开辟平原游击战争，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著名口号，在冀南平原打开一个有声有色的好局面。徐向前去山东时，没有抽调冀南的部队前往。朱瑞是从山西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去的。他带着一百多名干部，包括王建安、罗舜初等，都是从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抗大一分校挑选出来的。1939年6月上旬，他们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沂蒙山区，在沂南县东辛庄会见了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由随他们去的王建安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这时正赶上日军两万多人发动的第一次鲁中大“扫荡”。

反“扫荡”告一段落后，山东党政军机构着手统一建制，健全领导机构。8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原苏鲁豫皖分局改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组成，郭洪涛任书记。8月5日，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同意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向前、洪涛、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兼书记，以军政委员会为统一某一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定期讨论和检查当地党政军民工作的总方针，其决定分别由党政军民各方负责执行。”^⑤徐向前、朱瑞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就职通电，一方面是要造点声势，显示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另一方面有个正式头衔，好同国民党头面人物打交道、开谈判。

① 肖华：《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25页。

② 徐州失守后，日本侵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准备再从郑州沿平汉铁路南下夺取武汉。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的前进，下令6月9日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经徐州、淮阴以北入海，称为新黄河。抗战胜利后，重归故道。

③ 《陈光罗荣桓率部及陈光旅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41页。

④ 《罗荣桓传》编写组编：《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⑤ 《北方局关于同意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9年8月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19页。

一一五师和徐向前等先后来到山东，也引起国民党当局很大重视。徐永昌在1940年1月14日日记中写道：“徐向前一二万人在山东，徐为刘（伯承）之副。”“一一五师一万余主力在豫北、鲁北”。这是作为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八路军在山东的活动。同月19日日记又称：“午后会报，十之八为八路军扰晋扰鲁问题。”^①

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是两支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有着不同的经历、条件和作风的部队，各有长短，驻地分散，交往不便，虽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又都在山东地区，但要完全融为一体，需要有个过程。

徐向前曾叙述最初的情况：“山东的部队分散在各地区，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是必要的。但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萧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②10月13日，“为指挥作战之合理”，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的机关“实行合并”。“徐、朱、张、黎在一起办公”。^③

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后，继续向东移动，同山东纵队靠近。“1939年5月开始，师部率六八六团主力分批由泰西地区东越津浦铁路，进入新泰、蒙阴、费县、泗水等县的边区。10月进入费县南部的抱犊崮山区，与由我党发动和领导的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师”。^④

针对山东的实际状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致电徐、朱、黎、江并告陈、罗、黄、朱、彭、杨、左、傅、陆：“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为了使这两支部队逐步融为一体，电报继续说：“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的正规化。”“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的干部很多，应当好好的教育这些干部，纠正其弱点，坚定其革命立场。我们提议山东纵队应当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拨给一一五师，而一一五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这对双方工作都有很大益处”。^⑤

徐向前等坚决贯彻这些指示，采取了许多措施，特别是大规模地交流干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两支部队，交流人员，取长补短，是有效方法。一一五师战斗骨干多，我们报请中央批准，从那里调了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骨干。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山东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从中抽调了一些去一一五师，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0年，因一一五师担负的作战任务很重，需要大批兵员，山东纵队一次就拨给他们30000余人枪。这两支部队的人员交流，对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起了有效作用。”他还写道：“在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数量，造成武装力量大发展的局面。”“山东纵队1939年6、7月间是25000人，到1940年上半年，即发展51000余人（不包括调给一一五师的32000人）。一一五师1940年初是58000余人，到9月就发展到70000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武装自卫团等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6月间，山东纵队开始整编、整训。不久，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⑥可见这两支部队正逐步做到不分畛域，相互调动。

① 《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下同）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64、267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40页。

③ 《徐向前、朱瑞、张经武、黎玉关于一纵与山纵机关合并致各地电》（1939年10月13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25页。

④ 梁必业：《一一五师在鲁南》，《忆沂蒙》（上），第266页。

⑤ 《毛泽东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63、164页。

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50—652页。

这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着重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山东的游击战争虽然有了较好的基础,但在很长时间内对政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却严重缺乏认识,眼光只集中在军事斗争方面,没有用大力量来抓这项工作。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胶东地区。“1938年的上半年,在掖县、蓬莱和黄县先后建立了山东最早的三个抗日民主政权。同年8月,在这三个县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曹漫之同志任专员。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成立,标志着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形成”。^①而作为山东纵队活动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却只有游击队的活动,没有经过民选产生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国民党政府留下或委派的旧政权,对抗日游击战争起着阻碍作用。这种状况自然不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因为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能算个游击区,谈不上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②

在确定徐向前、朱瑞前往山东后几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9年5月19日对山东工作方针发出指示,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区县政权。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的财源决不应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③

从山东的情况来看,政权建设需要从县、区、乡基层做起。山东分局在7月1日发出《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示》,规定:“召开各区代表及县级各团代表(会议),产生县政府。县界应以地形及战争需要重新划分,并[不]受旧县界限制。”“县、区、乡长均须兼八路大队长、中队长及分队长职务,取得合法保障”。^④7月6日,徐向前、朱瑞致电肖华:“山东政权、民运都无基础,且此局势暂时不易好转。为造成山东巩固抗日根据地,我必须迅速建立抗日政权。”“你处应即拟定具体规定,向鲁北发展,树立各县抗日政权。凡逃跑与潜藏不暴面目之(国民党政府原有)各县长,我敢即委任或民选新县长,颁布施行方针,改造村区政权,团结同情者,组织地方武装,以便与胶济以北打成一片”。^⑤

12月6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在敌人‘扫荡’中,旧政权跑了,我军立即委任新的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然后再行民选,以树立新立政权。”“在我们领导下的某处政权(如胶东三县),应该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区,极力扩大其影响于全省全国,多写生动小册子向国内散播”。^⑥

进入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从原来设立的分散的专署、县、区、乡的地方政权,进而建立全省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水县青驼寺隆重开幕。大会由山东国民代表复选大会、全省总动员委员会、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工农青妇文化各界代表大会联合召开,所以简称“联合大会”。这时,全山东108个县中有抗日民主政权的已达79个,占三分之二强。并已建立10个专员公署和1个主任公署,拥有1900多万人口。这次联合大会通过《山东省临

① 《郭洪涛回忆录》,第155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1、642页。

③ 《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1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02页。

④ 《山东分局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示》(1939年7月1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10页。

⑤ 徐向前、朱瑞:《关于山东今后工作意见》(1939年7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11页。

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籍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62页。

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全省统一的民意机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订《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实际上就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留学日本的原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范明枢为参议会议长，黎玉任省战工会首席组长。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在 8 月 26 日闭幕。大会通过《联合大会宣言》，宣称“本会代表既为全省人民所选出，本会之意志，既受人民委托之重，又感同胞督促之殷，义不容辞，责无旁贷”。^①

这个全省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怎样的？黎玉回忆道：“新的民主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团结了各阶级人士。新政权首先实行累进制，合理负担税收，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以后又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加强财经建设，恢复和加强国民教育，建立了若干中小学校和夜校、识字班、俱乐部等等。新政权一扫旧政权腐败堕落的恶习气，县长和勤务员穿一样的衣，吃一样的饭，真正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②

与此同时，根据地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得到显著改善，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改善民众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了这样的政权，才可以说建立起巩固的完全意义上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反“扫荡”和反摩擦斗争的展开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领导的抗日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周围的环境却更加紧张和恶化，主要表现为日本侵略军大大加强对八路军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顽固势力大大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摩擦。

这种变化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处境影响极大。它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是武汉失守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引起的全局性变化所决定的。

日本侵略军本来以全力不断向中国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发动猛烈进攻，力图“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它的人力兵力有限而中国的国土那么辽阔，使它无力处处顾及。日方所编战史写道：“这样，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之极限，而以此态势进入长期持久战。”^③这样，他们大规模战略进攻已难继续，认为在占领区只控制重要城市周围和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已经不够，便掉过头来，用更多兵力在占领区内对抗日力量进行“扫荡”，以巩固后方，便于持久作战。

日本大本营制订了《对华作战指导要纲》，并在 1938 年 12 月 2 日下达命令：“大本营之企图，在于固守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定的长期围攻态势，力求对残余抗日势力加以制压并促其衰亡溃灭。”“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负责现下占领之华北地方的确保及安定，尤其是对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北部山西省以及蒙疆地方要点应迅速之恢复治安，并须确保重要交通线”。^④ 6 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发布《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在“方针”项下规定：“以攻占汉口、广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然后，主动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防止急躁。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并相应地推行其他各种政策。”它的第一条“要点”就规

^①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宣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0 页。

^② 《黎玉回忆录》，第 178 页。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1 页。

^④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 192、193 页。

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①这是日本侵略军作战方针的重大变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大大加强了。

国民党当局也多少觉察到日方这种变化。蒋介石在 1938 年 11 月下旬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说：“日本占领了武汉，并且接着占领我们岳州以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证明他的力量不够，气势已衰。”^②在武汉失陷前，因为国家民族已处在生死关头，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它的政策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国共关系比较缓和。但他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一旦觉得日本侵略军进攻的压力明显减轻，又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敌人后方发展得那么快，态度就发生急剧变化。

朱德对这种变化有生动的描写：“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像把孙悟空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从而加紧反共摩擦。

这种政策，在 1939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下来。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日记中记录了蒋介石在全会上的报告：“联俄与容共原非一事。”（当时只有苏联给予抗日以军事援助——引者注）“共产最狡猾”。“今日对共党不用兵、不利用、严管教应以为不二之律条”。^④这个变化，日本方面也多少觉察出来了。华北方面军的《战时月报资料》在 3 月间写道：“国共之间，表面上继续合作，但蒋委员长为扩大抑制共党势力之努力日趋明显。”^⑤同年冬，他们便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山东战场上都集中地反映出来。罗荣桓曾作过一个简明的概括：“那时日军为了扼杀敌后发展起来的抗日力量，在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之后，从前线抽调大批兵力回师山东，占据了大部分县城，并开始‘扫荡’平原。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下，也调整部署，加强实力，积极反共。于是，在山东战场上的三角斗争形势日趋尖锐复杂。”^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便不能不既反“扫荡”又反摩擦。不过，蒋介石同汪精卫不同，仍坚持抗日，依然是抗日阵营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反摩擦必须“有理有利有节”，留有余地。这就更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

先讲山东战场的反“扫荡”斗争，这依然是斗争的主要内容。

根据武汉会战后经过调整的作战方针，日本侵略军在 1939 年 9 月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上将为总司令，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为参谋长。华北方面军是它所辖最大的战略集团。徐永昌在 9 月 17 日日记中已注意到中日战场上的这种变化，写道：“敌常以杂军换下精军置于后方，此殊可注意者。”^⑦对山东影响更直接的是：“11 月 7 日，日本陆军下达第十二军司令部编成的

①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00、901 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2 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年版，第 130 页。

③ 《朱德在西北局干部会上的报告》（1943 年 8 月 18 日）。

④ 《徐永昌日记》第 5 册，第 9、10 页。

⑤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 237 页。

⑥ 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6 卷，第 3 页。

⑦ 《徐永昌日记》第 5 册，第 151 页。

命令。”^①它辖三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和骑兵集团主力，部署在山东全境和苏皖北部，司令部设在山东济南，很多年内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对手。

日本侵略军在山东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是1939年6月开始的。日方记载：“鲁南地区（胶济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山东省东南部地区）在徐州会战后，日本军未留驻兵力。”^②山东纵队最初较多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国民党的石友三、沈鸿烈、于学忠等部也先后在这里驻军。日军在山东的“扫荡”首先从鲁南开始，接着向鲁西进攻。

他们尽力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拿鲁南来说，“占领了所有县城，逐步打通各县城的联系，并伙同汉奸，向山区侵入”。^③

日军这次“扫荡”的做法和以前有所不同。徐向前把它的特点概括为七条：“（一）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二）‘扫荡’是不平衡的；（三）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四）‘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五）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六）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七）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④

面对这些武器装备精良又十分狡猾的敌人，应该怎样应对？罗荣桓总结道：“当时，在军事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那就是搞分散游击战，还是搞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尤其在当时山东的主要山区已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掌握了，我处于敌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灵活的游击战。”^⑤

这些由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地方游击队等进行的战斗中，规模稍大的有苗山战斗、大郝家埋伏战、梁山伏击战、治源战斗、五井战斗、泰山反“扫荡”战斗、总破袭战、孙祖战斗、白彦战斗、抱犊崮反“扫荡”战斗等。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不久，1939年5月11日，师机关和主力部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和中共鲁西区委等3000余人，被日伪军8000余人合围在方圆不足10公里的肥城县陆房山区。经过终日奋战，胜利突围。这次战斗，一一五师等部伤亡200余人，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包括日军大佐联队长等50多名军官。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占领区第一次遭受这样大的打击。泰西区武专员在战后说：“陆房这一仗，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开了鲁西的局面，而且也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信心，奠定了鲁西根据地的抗战基础。现在每天都有无数的小伙子要求参加八路军。”^⑥不过，这次战斗还是被动的突围，而不是主动的出击。

比陆房突围影响更大的，是这年8月由一一五师主动发起的梁山伏击战。

梁山就是《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在宋朝是一个面积很广的湖泊，以后湖水日益枯涸，成了一个盆地，中间只有不大的几个小丘。一一五师正在创建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7月底，日军从津浦铁路线抽调第三十二师团一个大队和伪军一部共400余人出发，在8月1日渡过运河，向梁山方向进犯。一一五师特务营和骑兵连将日军诱入独山庄伏击圈，在此设伏的第三营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日伪军多次突围未成，激战到3日晨共歼日伪军4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长田敏江大佐以下300余人，俘日军13人，缴获炮3门、轻重机枪20余挺、长短枪150余支、战马50匹，创造了在兵力相当、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8月4日，日军调集5000余人、汽车100余

①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195页。

②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271页。

③ 梁必业：《一一五师在鲁南》，《忆沂蒙》（上），第267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53页。

⑤ 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3页。

⑥ 张仁初：《陆房突围》，《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444页。

辆、坦克 30 余辆分两路对运西地区进行“扫荡”，一一五师独立旅利用青纱帐同它周旋，日军处处扑空，又不断受到打击，只得在月底撤回。

罗荣桓对这个战例作了分析：“如梁山战斗，假若光看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几门炮，这只能说明在军事作战上的成绩。仅看到这一点还很不够，主要应该看到在当时大家对平原作战还缺乏经验，这次作战后增强了胜利信心，感到在平原和山地一样可以作战，消灭敌人。这样，就把某些战斗的战略意义突出出来了，军事斗争就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①

正是采取了这种游击、破袭、麻雀战等手段，不断打击日伪军，是敌强我弱条件下最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式。徐向前总结道：“反‘扫荡’的零星战斗几乎天天进行，不可胜数。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 1938 年下半年至 1940 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 2000 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 20000 名，伪军 25000 余名，破坏公路 12000 里，铁路 500 余里，击落敌机 3 架，击毁兵舰 1 艘，汽艇 7 只，炸毁汽车 86 辆，火车头 36 个，列车车厢 162 节。这些胜利，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强大威力，显示了我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一次次的新‘扫荡’均告破产。我军愈战愈强，在战术思想、指挥艺术、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等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样，就为我们向更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

可以看出，日本侵略军对山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扫荡”和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民反“扫荡”斗争，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当时在山东作战的黎玉等写道：“徐向前和朱瑞同志一进入山东，就遇上日寇对山东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敌酋植田大将的指挥下，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鲁中山区扑来，妄图一举围歼我分局和山纵首脑机关。朱瑞和徐向前与山纵领导同志决定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分散性的游击战争，使我军主力多次灵活避开了敌人的合击，经过一个多月苦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0 年，日寇在山东周围集结了两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和八万多的伪军，以军事、政治、经济等联合手段，不断向我进行疯狂扫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及时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略方针，领导军民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打法，积极捕捉战机，不断打击、消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的二十多次扫荡，同时利用敌人的扫荡间隙，积极开展攻势，恢复和发展根据地。”^③

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发展，本来力求 1940 年底以前解决中日战争。这个计划自然无法实现。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年 8 月起，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河北各地和主要交通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 2.5 万多人，破坏大量铁路、公路、桥梁和隧道，给了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④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一、八路军截断山西各铁路之行动，对敌军精神与计划上必受一打击。二、八路军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⑤为了配合百团大战，从 8 月起，一一五师动员鲁南军民对日伪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徐州北段、陇海铁路东段

① 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6 卷，第 1 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 656 页。

③ 莫文骅等：《功勋卓著，永垂不朽——纪念朱瑞同志牺牲三十五周年》，郑建英编：《怀念朱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 页。

④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4 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 年 8 月 29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进行大破袭,连克几十个据点,歼灭日伪军 1500 人左右。山东纵队所属各部队向当地日伪军发起攻击,袭击莒南、日照以及沂蒙山区的青驼寺、北大寨、所孝庄等日伪军据点,毙伤日伪军 400 余人。

在抗日战争中,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八路军包括在山东的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如果不能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断以坚决而有为的军事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不可能得到民众如此热烈的拥护和支持,也谈不上如此迅速地在敌后建立起并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

再来看山东地区的反摩擦斗争。

日本侵略者这一大敌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的是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原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看到并力求避免的。

抗战开始后初期的 1938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的演讲中说:“因为中国今天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① 这个目标,就是合作抗日。3 月,他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② 5 月,他对抗大一大队成立的演讲词中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已经证明了的。”^③

在山东,中国共产党正是努力这样做的。

当日军大举入鲁、韩复榘挟重兵不战而退时,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大义凛然地在聊城通电全国,决心留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并陆续收编大批游击武装,成立 30 多个支队。1937 年 10 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张霖之到聊城,以省委代表的身份领导鲁西、鲁西北党的工作。省委又先后派赵健民、齐燕铭、张维翰、张郁光等和红军干部洪涛、王幼平等 300 多人到范筑先部工作。

1938 年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回山东时面交范筑先。黎玉回忆道:“毛主席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对范筑先进行鼓励和慰勉,肯定了他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鼓励他坚决抗战到底。”“当我亲手把毛主席的信交给范筑先的时候,近六十岁的范老高兴异常,非常激动地抖动着双手和花白胡子,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与此同时,我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武汉版的《论持久战》一书,分别送给范老和张郁光等同志”。^④ 不幸的是,在他们这次见面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包围了聊城,由于敌众我寡,聊城陷落,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光荣殉国。

山东沦为敌后以后,被割断在豫北敌后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还有石友三、高树勋部。石友三东北籍,原隶冯玉祥部西北军,是个一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旧军阀。但七七事变后,他曾继吉星文团

^①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1938 年 2 月 11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9、90 页。

^②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第 113 页。

^③ 《毛泽东在抗大一大队成立时讲演词》(1938 年 5 月 4 日)。

^④ 黎玉:《毛主席让我带信给范筑先的经过》,《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6 卷,第 222 页。

坚守卢沟桥近 20 天。在他的部队中有一些共产党员（他的秘书是中共秘密党员陈壮猷），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的张友渔也曾由北方局派到石友三家中讲学。因此，中国共产党仍尽力争取他合作抗日。石友三也表示愿与中共合作，在 1938 年初派在石部的秘密党员张克威到延安同中共中央联络。3 月间，张克威回到石部，带来毛泽东给石友三的亲笔信。“毛泽东同志赞扬石友三决心留在敌后抗战，并表达了我党同他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信中还说：应你的邀请，我派了十多名干部到你的部队帮助工作。他们如有违反统一战线的行动，可以随时派遣回来（大意如此）”。^① 4月初，在武汉的周恩来介绍张友渔到石友三部队，担任六十九军政治部部长。6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又派匡亚明来石部担任副部长。不久，石友三率部从豫北进驻鲁中的莱芜、蒙阴、新泰、沂水一带。6月初，石部扩编为第十军团，石友三升任军团长，张友渔、匡亚明升任军团政治部正副部长。石友三还取得鲁南行政长官的名义。在一段时间内，石部多次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合作，对日伪军队作战。

7月 22 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刚由中共山东省委改组成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1. 对石友三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2. 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局部摩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之方针。”^②

就在 7 月间，石友三在新泰县龙廷镇召开协商会议，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郭洪涛，范筑先的代表等一百多人出席会议。秦启荣等因意见不合中途退席。但共产党、石友三和地方实力派仍达成两项协议和三项君子协定。“三项君子协定是：（一）彼此不搞摩擦；（二）不能互相瓦解部队；（三）不许向友军扩张地盘”。石友三还把土肥原派来说降的说客当众枪杀，并宣称：“我石友三要当汉奸，就是三尺孩童也有权杀掉我。”^③

可见，中国共产党争取同石友三合作抗日是有诚意的，并且收到了实效。但石友三毕竟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随着蒋介石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把重点转向反共，石友三的政治态度发生重大变化。1938 年 12 月，国民党政府任命石友三为晋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部移驻河北省南宫、冀县一带。石友三随即免去张友渔的军团政治部部长职务，撤去中共派在石部的人员，同八路军加紧摩擦，局势陡然逆转。他此前的那些进步姿态，其实不过是脚踏几只船、抬高身价、待价而沽的表演而已。1940 年 6 月，石友三直接同日本侵略军勾结，派他的弟弟石友信等到开封同日本驻军司令官佐佐木签订“防共协定”。12 月 1 日，他到高树勋军部时被扣留处决，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石友三部转往河北后，国民党在山东的反共急先锋是沈鸿烈和秦启荣。沈鸿烈在抗战前是青岛市市长，韩复榘被处决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游击总司令。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 1940 年 7 月致蒋介石的通电中写道：“自去岁‘扫荡’以来，沈主席曾无数次命令鲁南各军进剿职部，曾无数次密令捕杀共产党员，曾密令各地封锁职军给养，曾嗾使督导团破坏民众团体，更曾密令对八路及共产党人‘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以致自去年 6 月至 11 月中，职军被进攻达 90 多次，被杀共产党员及职部军人达 1350 余，扣去人员达 812 人，缴去枪械达 2057

① 张友渔等：《我党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概述》，《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8 卷，第 223 页。

② 《毛泽东、胡服致郭洪涛并告朱彭电》（1938 年 7 月 22 日）。

③ 张友渔等：《我党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概述》，《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8 卷，第 225 页。

支,对职部军人家属之烧房、罚款、污辱、掳掠钱财更不胜计。”^①他的主要打手是秦启荣。

秦启荣,黄埔军校六期生,30年代初曾任山东民众训练总干事、国民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复兴社山东负责人。沈鸿烈担任省主席后,发表秦启荣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秦启荣本人除党、团、特活动外,重点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三纵队司令名义发展武力,拉拢招收地方散兵游勇、土匪、流氓和欺骗一些爱国人士。1938年,他拼凑的乌合之众约有两万多人,专在淄川、临淄、博山、安邱、泰安一带活动搜缴民间枪支,抢劫人民粮食、财物,以致广大群众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当时这一带传言:‘秦家防地,天比别处高’(意思是地皮刮深了)!”^②

秦启荣的反共摩擦活动,自1938年4月起,不断暗袭强夺,杀害八路军干部。1939年3月30日,他更指使所属王尚志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天河惨案。

山东纵队负责人张经武、黎玉联名发表告全国父老、军政当局、救亡团体通电,叙述了这次惨案的经过:“上月30日我第三支队交通营,派两连武装护送60名干部南下受训,迨达淄川同古村,即通知同古太河一带之秦部请准假道,不料彼辈包藏祸心,阳允所请,暗事伏击,造成空前未有、令人骇汗之悲惨事件,致我三支队政治部鲍主任、吕营长等人当场牺牲,团长潘建军及一部同志或遭残杀,或被囚禁,迄今渺无踪影,百余名热血抗战志士,无端遭此囚杀,良堪痛心,噩耗传来,悲愤交集。”“我八路健儿何负于国家?更何负于友军?而一再摧残,逼人者斯之甚!时至今日,为抗战前途计,为国家民族计,对此抗战逆流不得不彻底纠正,电呈国府,严惩祸首,呼吁全国主持正义,俾此案迅速解决,以平士气,而固团结,不胜慨慨待命之至!”^③

4月10日,北方局向郭洪涛、张经武、黎玉作出指示:“在我党各方面开展反摩擦斗争中,山东范围内,对此等顽固之极之徒与处心破坏团结之行为,在有利情况下给予严格打击是必要的。否则,此等事件将对我不利。”指示对如何开展反摩擦斗争仍留有余地,写道:“同意你们对此次事件之方案,但应注意:甲,只打击秦部,尽可能分化争取或孤立其他数部。乙,在有利条件下打击并歼灭其一部,作此事谈判之优势根据,一般不宜扩大。”^④20日,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对秦启荣进行反击,歼其一部,收复天河地区。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在5月19日对山东工作指示:“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⑤中共中央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徐永昌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军委会开会讨论八路军问题。”“原因去岁以来八路军由第二战区范围内自由溢出。初以其击敌,也感忽视之。继因其组织民众,成立政治系统,处处妨害国军及妨害冀鲁皖省政”。^⑥可见国民党当局已不将是否有利于抗日放在第一位,而在酝酿和准备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6月10日,“又在军委会讨论八路军问题,任潮(李济深)、为章(刘斐)主画给较大区域以安之,陈立夫、朱留仙(当为朱骝先,即朱家骅——引者注)以为不当”。^⑦把国共关系问题提到军委会讨论,可见国民党当局已把这

^① 《八路军一纵山纵为沈鸿烈指使部属进攻八路军给蒋介石的通电》(1940年7月16日),《山东抗日根据地》,第39页。

^② 徐叔明:《我所知道的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③ 《张经武、黎玉关于国民党秦启荣等部破坏抗战问题的通电》(1939年4月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11、412页。

^④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对山东顽固派斗争策略的指示》(1939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第180页。

^⑤ 《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1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02页。

^⑥ 《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69页。

^⑦ 《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74页。

个问题看作需要用武力解决了。徐永昌在日记中也感叹道：“中央对军事、政治工作不自努力，遽进而日求对付八路军，是真舍本逐末。”^①6月29日日记中又写道：“晚8时在辞修（陈诚）寓，又集议对八路军办法，无聊极。”^②

这年8月，秦启荣又连续指挥制造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在淄河流域集中4000余人围攻共产党领导的部队10余天。从这年6月至12月，共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名，扣押干部战士1000多人。山东纵队忍无可忍，由张经武、王彬指挥山纵第一、三、四支队，在几天内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地区，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救出部分被俘人员，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缴枪2000余支。秦启荣率领残兵败将西逃，无法再成为一支反共的重要力量。

1939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为副总司令）率东北军第五十一、五十七军约两万人，从大别山区和苏北进驻鲁中和鲁南。

八路军对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合作抗日的军队仍有区别地对待。于学忠和沈鸿烈都是原东北军将领，但两人不同。于学忠有爱国心和抗日的要求。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夜曾写信给他说：“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③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时，留下手令：他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蒋介石对他一直心怀疑忌。抗战开始后，他曾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英勇作战。调山东后，他对所部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即不离：因为你和他太近了，他就把你溶化了；你若是离他太远了，他就用武力解决你。”他又说：“我们在鲁苏战区采取的策略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④于学忠部内也有一些秘密的共产党员。谷牧就是于部第一一二师的中共师工委书记，公开职务是旅部中尉书记兼战地工作团主任。^⑤

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于学忠是中间派。徐向前写道：“于学忠是原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蒋介石一面利用他，一面排挤他，他明白，我们更明白。因而，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对我们态度强硬些，但并没有说过八路军多少坏话，是留了回旋余地的。这就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属于我们的争取对象。”^⑥

中共中央及军委也致电徐、朱、陈、罗，指出对沈鸿烈、于学忠部应采取不同方针。电文说：“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摩擦，故须于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是其最坏之一部）之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⑦

因为于学忠是有着两面性的中间派，双方对有的问题也有意见不一致和发生矛盾的地方，主要是在八路军建立地方政权问题上。徐向前曾代表八路军同于学忠进行了一次谈话，对他进行争取，以便孤立沈鸿烈。于学忠客气地讲了要联合抗日，强调东北军和八路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徐向前回忆道：“接着，他的话题就转入政权问题。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

① 《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84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87页。

③ 《致于学忠》（193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④ 牟中珩：《我所知道的于学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⑤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6页。

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59页。

⑦ 《中央、军委关于对沈鸿烈于学忠部应采取不同方针的指示》（1940年2月11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228页。

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谈判回来,我们仍按自己的办法干,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拿八路军没办法”。^①

反摩擦斗争中对国民党在山东的各派系如何区别对待?中共中央在1939年12月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指示:“在反摩擦中,应当利用国民党各部分彼此间的各种矛盾,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因此,对秦启荣及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取坚决消灭、毫不妥协、毫不犹豫地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工作。对沈鸿烈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方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正拒绝,不可让步。对中间分子如老同盟会及公正绅士等,应联合之,并发动其积极性。”^②

东北军内部情况也相当复杂,并且前后发生过重大变化。事情主要发生在驻军沂蒙地区的第五十七军(辖两个师,一个师长是常恩多,一个师长是霍守义)。军长缪澄流思想顽固,到山东后就同沈鸿烈相勾结,不时向八路军挑衅。他多次讲:“我们喊抗战喊了几年了,抗得怎么样?地方一块块失掉,军队到处受损失,我们是上当了,上了共产党的当!”^③1940年9月,他秘密派代表同日本上尉参谋辛修三商谈互不侵犯和共同防共。第三三三旅代旅长万毅是谷牧在东北军介绍入党的秘密共产党员,得知信息后立刻告诉有爱国思想、对蒋介石不满的第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常恩多极为愤怒,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准备逮捕缪澄流,但被叛徒告密,缪澄流脱逃。这就是造成很大影响的“九二二”锄奸。以后,经过一些曲折,1942年8月3日,常恩多在病危时决定把部队拉出来,改称“东北挺进军”,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万毅不久后担任八路军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这已是后话了。

对蒋介石来说,他在山东的军事部署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并没有嫡系的中央军在那里。战前山东的军事由韩复榘控制。抗战爆发后,韩率部不战而退,日军长驱南下,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是在陇海铁路一线防御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继续南撤,蒋的嫡系部队没有一支能像八路军那样深入山东敌后作战,更谈不上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留下的只有一些杂牌军(包括东北军等地方部队)。这个弱点到此时便暴露出来。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考虑派黄埔出身的李仙洲率3个师开入山东,但迟迟无法实现。其原因,徐永昌在1940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解释:“余[以]为国军不敷分配,如李仙洲奉命援鲁,一年不能出发。”^④徐永昌讲的是事实。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只能用在有自己后方作依托的防御作战上,没有能力深入到环境极端险恶的敌后,长期生存并打开新的局面。这是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摩擦活动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的重要原因。

1940年夏秋间,山东党的领导机构有较大的变动。5月间,遵照中共中央来电,徐向前回延安,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郭洪涛在回忆录中记载:“9月山东分局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参加党的七大代表,我被选为代表之一。我去参加会议期间,分局书记由朱瑞同志代理。”^⑤10月,郭洪涛、张经武率领山东代表团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次代表大会后来延期到1945年召开)。

到这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各方面已经初具规模。这是三年多前、也就是抗日战争开始时难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29页。

③ 《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340页。

⑤ 《郭洪涛回忆录》,第161页。



以想象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对这时的状况作了简要的概括：

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扩大了鲁西、清河、鲁中、鲁南、胶东、湖西及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开辟了苏鲁豫皖和苏皖边区根据地，党员发展到11万人，建立起中共鲁西、清河、鲁中、鲁南、胶东五个区委和湖西地委；成立了省战工会，建立起鲁西、清河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十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扩军和整军计划，第一一五师发展到7.6万余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初步实现了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全体武装党军化。^①

这为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未来两年艰难岁月的考验作了重要的准备。

最困难的两年

《毛泽东选集》第3卷一篇题解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②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资料也称：“昭和十六、十七年属于‘解放区’最艰难的斗争阶段。”^③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如此，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是如此。

山东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左右的发展和经营，力量已有很大增加。为什么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又会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已难以实行“速战速决”式的长驱直入，而要回过头来着重考虑如何巩固他们对占领区的统治，作更长期的打算。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后方已构成日益巨大的威胁。百团大战给它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也使它感到震惊。1940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编印的《对华北方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中已写道：“共产党之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而执拗，已逐渐成为我治安之最大障碍。”1941年1月，华北方面军召集所属兵团长会议。在方面军司令官“训示”中着重提出：“在华北，我军努力之重点，应集中于共产党、军一节，业经多次训示在案。”^④1941年7月，日军以此后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大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他又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属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⑤他们在华北占领区（包括山东在内）自然将八路军作为主要对手，将更大力量放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上，无论规模之大和手段之残酷都远远超过以往几年。

第二，蒋介石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

^①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编辑室编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黄河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②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③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146页。

^④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599、667页。

^⑤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325页。

量的发展却被他看作心腹之患,于是加紧反共活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进到濒临破裂的边缘。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不顾一切地做出这样决绝的决定,是经过充分考虑,下了狠心的。徐永昌在1940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这种考虑:“欲免其祸,迟早必出于一战。再迟恐至无能与战。至英美因此认我力量减低,但我力量不减时彼又有何真助于我?(即彼助我亦因彼需要。)俄国当然怀恨,但我此时终较共党力量伟大,彼今尚利用我困倭,如抑我扶共,此时尚感缓不济急。倭寇自喜我相煎,我利其或因此放心而提前南进。今日拒倭同时制共,虽不利然尚能制共以图存。他日我拒倭而俄助共以和倭,则我不惟不足拒日,且恐不能自存。”^①可见他们用心之深、下手之狠。

下了这样的毒手,他们还不罢休。接着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和弹药,加紧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和物资封锁,企图把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军民困死。敌后抗日根据地由此在经济上也造成严重困难,这是抗战开始后几年来所没有的。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对山东说来,更突出的是日本侵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反摩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毕竟是不得已的自卫行动,给来犯者一定惩罚后便适可而止。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集中打击的依然是日本侵略军。1940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联席会议,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正判少将就该年作战实施要领做了说明。他对“讨伐目标”这样说:“共产军对我占领地区之进击,活动实甚猖獗,此将成为今后治安肃清上最大关心之问题。”“因此,次期讨伐肃清之重点,特别集中指向共产军,一心一意加以毁灭”。^②可见日本侵略军在遭受“百团大战”前已将八路军看作“讨伐目标之重点”。

如果说日军在1940年所说“将成为今后治安肃清上最大关心之问题”还多少带有预言的意味,那么到1941年和1942年便在实际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上清楚地表现出这种重点转移。为了加强华北方面军,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从华中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三两个师团到华北,使华北日军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团约30万人,还有伪军10万多人。其中,第十二军所属两个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位于山东和苏皖北部。他们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残酷“扫荡”“蚕食”,并在1941、1942两年内连续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些都是它所谓的“总力战”。

日军这时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新特点是:集中兵力,统一行动,有重点地进行分区“扫荡”,并以汽车、坦克和步兵组成机械化部队,千方百计迅速捕捉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力图围歼。他们所说的“蚕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依托交通线和据点,对根据地进行“边缘蚕食”;另一种是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根据地建立据点,进行“跃进蚕食”。此外,还采用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

这自然给山东抗日根据地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肖华把这两年的艰危和以往比较,写道:“1939年和1940年,敌人在山东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共25次,其中万人以上的2次;到1941年和1942年则增加到7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9次。至于千人以下的‘扫荡’和出扰,无日无之,平原地区尤甚。敌人的‘扫荡’办法一般多采取‘分进合击’,也采取反复平行推进的‘梳篦式扫荡’。在多次‘扫荡’失败以后,敌人又集中更多兵力,采取大纵深重重包围的‘铁壁合围’战术,到1942年又发展为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拉网合围’是敌人在敌后进行‘扫荡’的顶峰。”^③

① 《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477页。

②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446页。

③ 肖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183页。

日军在山东的这种残酷扫荡,几乎遍及山东各地,时间也持续不断。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两次:一次是1941年11月2日至12月28日的鲁中山区大“扫荡”;一次是1942年10月26日至11月中旬的鲁中区“扫荡”。这两次“扫荡”的重点都是沂蒙山区,那是八路军在山东的心腹根据地。如果把这两次比较一下,不难发现日军1942年“扫荡”使用的兵力和时间远少于1941年,而八路军的战斗力、作战经验和军民关系大大优于1941年,这是在这一年之间敌我力量消长发生的明显变化。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醒目的“拐点”,很值得注意。

对日军的“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在应对上是有一定准备的,对自己存在的不足,也有冷静的估计。1941年4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致电已离开山东的徐向前、郭洪涛、张经武,谈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应对力量仍感不足:“自你们去后之一年半中,由于中央、北局、军委、集总领导之正确与全体同志之努力,山东一般工作至去年秋间大致已开始其初步的优势。但其不平衡、不巩固,不但在外部不易改变,即本身之努力与继续坚持性亦不够。”“除我们努力不懈继续发展、强调巩固外,因干部缺乏,每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山东干部之弱,自分局起比华北各地一律低下一级至两级。山东地方之广大、干部之稀少,在极度遽速发展下,不得不更加□□分局,因此也更见薄弱与缺乏”。^① 山东抗日根据地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发展得那样快,山东的地方又那么大,干部缺乏,存在不足确实是他们所说的“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经过郑重考虑,在1941年8月做出指示:“为了保持华北、华中联系,必须加强山东。我军在山东力量近八万人,而作战指挥至今尚未统一。中央和军委认为,加强山东方面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为加强山东的先决条件。”^②为此做出决定: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将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靠拢后,山东分局是“暂时”组成的,并不是最后确定的;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新合组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可见中共中央已在考虑由政治和军事经验更加丰富的罗荣桓来负责山东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个考虑是恰当的,实施的步骤是稳当的。

指示发出的第二天,山东分局立刻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报告:对“统一山东领导的决定完全接受”,“为建立分局集体领导,并发挥分工作用,分局八月的会议决定分工如下:(1)陈主财委会,(2)罗主军事,(3)黎主政府工作,(4)朱主党的组织”。^③ 值得注意的是:陈光本来是一一五师的代师长,分工却主管过去不由他管的财委会,当前最重要的军事工作由罗荣桓主持;朱瑞虽仍是山东分局书记,却没有规定主持全面工作,只是“主党的组织”。领导山东全局的责任更多地转向罗荣桓,情况正在过渡中。

这时,山东的军事局势,从总体说,仍是敌强我弱。1941年年初,日军把鲁北、湖西作为“扫荡”的重点,企图割断津浦铁路东西的联系,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还不能构成全局性的威胁。这年7月,日军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大将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开始精心地全盘策划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行动。11月初,日军驻山东的第十二军得到从其他地区的增援后,集中3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为主力,加上第三十三师团一部和伪军,共5万多人,由十二军司令官土

① 《朱瑞关于山东工作情形致徐向前等同志》(1941年4月12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183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指示》(1941年8月1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425页。

③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指示〉的报告》(1941年8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426页。

桥一次中将指挥,发动对鲁中沂蒙山区的大“扫荡”。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畠俊六大将在行动时亲自到临沂督战。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日军“扫荡”的目标是消灭中共在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

针对日军的意图,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直属队转移到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区;山东纵队第一旅主力转向包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鲁中军区、各军分区以及县区武装就地坚持斗争;活动在鲁中区附近的部队对驻地日伪军发起攻势,牵制他们前来增援,以配合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1941年冬对鲁中山区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期为所谓军事的铁壁合围(即军事的疯狂合击战、搜索战),企图聚歼我主力于根据地内,使我根据地失去屏障。此期甚短,共约十日。我应付方针是主力分散跳出合围圈,保存力量,并发动外围战,以分散敌人,减弱根据地的压迫。”^①

日军对这次“铁壁合围”行动的期望很高。日方的战史写道:“本作战乃系以歼灭沂蒙(沂州、沂水、蒙阴)地区中共党军,铲除其根据地,同时与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相配合,借以大为提升治安肃清之成效为目的。”“此项计划,在其规模上,殆可匹敌于方面军直接指导之晋察冀边区肃清作战”。^②那时,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在靠拢后集中在相近的狭小地区。肖华写道:“敌人首先袭击了我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紧接着又以精兵30000,在坦克、飞机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我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驻地留田(临沂北50余公里)一带猛犯,同时在沂河以东隐蔽地布置了强大兵力,准备诱歼我向东转移的兵力。”^③

他们准备在第二天天亮时发起总攻。情势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罗荣桓冷静地判断:“日军‘扫荡’,妄图围歼我们山东的指挥机关,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我们乘机插到他们大本营临沂地区,他们是料想不到的,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④决定乘黑夜朝日军大本营方向突围,再转到便于机动的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他经过侦察,在11月6日拂晓,指挥党政军领导机关近5000人从日伪军包围的缝隙中,迂回曲折地越过三道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一人伤亡,胜利突出重围。原在沂南县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也在6日天黑后突围。

“第二期为‘清剿’战并配合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即将主力撤回,扩大包围区,部署兵力,广竖据点(约六十余),以利经济的彻底破坏与政治的欺骗麻醉,辅以军事的穷搜摸索,以根绝我一切抵抗,企图完全打碎我根据地,使我主力无所依托。此期甚长,约三个星期。我应付方针为主力部分分别回转,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插入点间隙间活动,以小的游击动作对付敌人搜索、破坏与伪化活动,广泛组织与恢复游击小组或分组十人至几十人的特务小队以打击敌伪汉奸的宣传活动,并团结群众进行战时锄奸工作,以支持政权镇压奸细叛徒。”

第三期为第二期“清剿”战的延长。敌人主力他调,为防我反攻,守备兵团仍集中使用,控制我重要出口、大道、河口与进行轮番合击,以打击我暴露部队”。“此期约半个月。我应付方针为相当集中兵力,以营为单位互相呼应配合,以地方零星小部队实行打击伪军投降派及小股日军,以迫使其实后退与集中,减少敌伪疯狂活动。对地方则开始有计划的整理组织,恢复领导,及整理与建立各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敌人对鲁中山区大“扫荡”的初步总结与指示》(1941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668页。

^②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903、904页。

^③ 肖华:《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忆沂蒙》(上),第106页。

^④ 肖华:《尊敬的良师,可亲的长者》,《回忆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基点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队、自卫团等)”。^①

这是日军在山东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反映出一场比较完整的八路军反“扫荡”斗争的发展过程。经过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打击，加上日军兵力受太平洋战争的牵制，担负“扫荡”的日军最后不得不在12月下旬收缩撤退。

在这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共作战150多次，歼敌2000多人，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但最初对日军这次“扫荡”的规模、残酷性和持续性还是估计不够，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不小的代价：部队伤亡1400多人，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Hans·Shippe)、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一一五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蒙山支队政委刘涛等牺牲，群众被杀害和抓走的达1.4万余人，被抢走粮食160余万斤。一部分群众中也出现过一些消极以至抱怨的情绪。

朱瑞严格地检查道：“这一年斗争中，由于我们领导上犯错误，未能及时转变方式，着重依靠群众，分散荫蔽，深入下层，厉行对敌斗争，加强巩固建设工作，故削弱甚大。尤以年终(11月5日起—12月底止)沂蒙大‘扫荡’，更空前的打击及震动了我们。但这一打击，同时也警觉了我们，开始在思想及领导上去检讨自己，指出了我们领导上犯有脱离群众的官僚倾向，对敌斗争的和平倾向，领导上的不民主，作风上的机会主义、太平麻痹、英雄主义等。这一检讨开始了分局领导的转变。”^②

中共山东分局从这次战斗中总结出两条教训：“第一，中心总结在于作风问题，如斗争中的和平倾向和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即一切工作仍停留在前一阶段的粗枝大叶的毛病上，即如不管平时或战时，不管环境的顺利和逆转，工作上仍多千篇一律，照旧行事。”“第二，中心总结在于对华北敌后战争敌我形势与‘扫荡’严重性认识不够，事先未能认真迎头接受山西及其他各地的经验，‘扫荡’仓促到来又未能周密布置，这些更助长了认识上的和平倾向及反‘扫荡’动员中的形式主义”。^③罗荣桓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在领导上过去对于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这些教训，对各级干部都有切肤之痛。部队正是在这种实战经验教训的磨练中逐步成熟和生长起来。

这一年，罗荣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他认为，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不能采用过去常用的“诱敌深入”的方法。主力部队不是置于根据地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日军根据地的边沿区，在弄清敌人动向后，乘它包围圈尚未紧缩而有较大空隙时，选其弱点，翻到它的后方去，打乱日军的部署，粉碎它的“扫荡”。这一战术，对以后夺取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战争全局各方面的处境日益不利，兵力更显不足，军心日趋涣散，一时难以组织起大的“扫荡”作战，在山东以至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更侧重于采取“蚕食”政策。6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政治部联合发出指示：“目前敌人正根据‘解放东亚’、‘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口号，以政治伪化、军事清剿及经济上的配给制度，对我华北各根据地进行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敌人对鲁中山区大“扫荡”的初步总结与指示》(1941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668页。

② 朱瑞：《忆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下册)，第781页。

③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敌人对鲁中山区大“扫荡”的初步总结与指示》(1941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669页。

全面的蚕食阴谋。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目前之处境正是破晓前的黑暗,另方面又说明我们以全力展开反对敌人政治、军事与经济的斗争,配合正面作战,正是目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①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表面上还在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继续发动“扫荡”和“蚕食”,其实却在一天天走下坡路了。这就是指示中所说的“破晓前的黑暗”。

这年秋后,日军“开始普遍‘扫荡’,由鲁西、鲁中、胶东而冀鲁边、清河、鲁南、湖西,均已‘扫荡’过。惟‘扫荡’兵力不甚大。‘扫荡’鲁西、鲁中、胶东敌伪均在两万以下,除胶东‘扫荡’约两月外,时间均不长(鲁中半个月,鲁中五天,其余三四天不等)”。^②

由于有了 1941 年冬反“扫荡”中的经验教训,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形势的估计更加冷静。从 1942 年 8 月开始,罗荣桓连续发表《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对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的估计和今后的任务》《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等文章,提出:“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很细腻的组织我们的一切力量,发挥出对敌斗争的创造性,坚强我们外围游击区的工作,向着敌人的紧缩包围封锁圈拉破口子,使敌人纵深点面控制有不牢固的环节,使我们有条件地向着敌人占领地带上打击他们的虚弱。这是我们当前对着敌人斗争的方针。”^③

八路军的行动,特别着重在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使日军疲于应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优势。鲁南的铁道游击队便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对伪军也展开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取得明显成效。

10 月 26 日到 11 月中旬,日军再一次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对鲁中山区的“扫荡”。这次“扫荡”,是日军分别对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万人以上的全面“扫荡”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侵略者面对江河日下的战局时力图挽回颓势的一次无力的挣扎。

在山东,他们采取更狡诈的方法:先施放烟幕:在清河区寿光以北地区和鲁中的泰山地区进行“扫荡”,再以 2000 多人的兵力向渤海区佯动,以坦克、汽车多辆朝这个方向开进,这几路日军都公开暴露,行动极缓慢,有意散布“扫荡”渤海区的假情报,引诱沂蒙山区的山东军区主力来援。它的真正目的是:集中日军第十二军的两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一部共 1.5 万余人向沂蒙山区进行“扫荡”,并在沂蒙山区的南墙峪设伏,打算将赴援滨海地区的山东军区部队合围,力图将它一举全歼。山东军区看破了他们的计谋,及时跳出合围圈,其他部队经激战后在黄昏也分路突出重围。为了策应山东军区机关突围,一一五师指挥鲁中地区各部队广泛出击,牵制并分散日军兵力。11 月中旬,日军计谋落空,被迫撤出沂蒙山区。这以后,他们又以 1.5 万余人的兵力,采取“拉网”战术,企图消灭八路军胶东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八路军大部也突出重围,向滨海地区转移。在八路军内外线部队的打击下,日军原来策划的作战目标一一落空。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不得不抽兵南下,兵力更加不足,被迫在 12 月底撤回原据点。

在这次反“扫荡”中,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 150 多次,歼日伪军 2000 多人,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再次保存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有生力量,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党政军人员伤亡 1400 多人,群众被杀 3000 多人,被抓 10000 多人,鲁中根据地缩小一半。

山东分局宣传部印发这次战役经验教训,指出日军这次“扫荡”的新特点:“鲁中区是山东的心腹根据地,曾经去年五万敌人‘扫荡’的考验,今秋敌人为配合其‘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我鲁中

① 《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政治部对敌之蚕食政策的指示》(1942 年 6 月 1 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9 卷,第 225 页。

② 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 年 1 月 28 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0 卷,第 60 页。

③ 《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1942 年 8 月),《罗荣桓军事文选》,第 138 页。

区进行疯狂‘扫荡’，虽其使用的兵力与‘扫荡’的时间远逊于去年，但其阴谋之毒辣则有过之无不及。”“敌这一企图经我在旋崮顶部队坚守给敌严重打击后，各部胜利突围，敌聚歼计划完全破产”。^① 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以后很难再发动起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这两年间比较缓和。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斗争中需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时，反共最力的石友三、秦启荣等已先后失败，于学忠抱着中间派的态度，而且接连遭受日军打击，实力削弱。朱瑞等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于学忠先后遭受三次‘扫荡’，伤亡甚重。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1942年这一年从17万人减至9万多人，一年之间锐减一半，故内部颇呈动摇涣散。”^② 蒋介石准备调遣入鲁的李仙洲又迟迟没能开入山东，国共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苏、英等国都不愿看到中国发生内战，对蒋介石也起着制约作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左、陈、刘称：“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蒋介石虽已派李仙洲之侯镜如第二十一师（不是派何柱国）进至陇海路北，策应鲁于、苏韩，该部亦正在设法推进（现仍在涡河以南），但困难甚多，既阻于彭（雪枫）部，复阻于日寇，不易达到目的”。“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③

总的说来，这两年国共关系在山东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日军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田副正信中佐在手记中也写道：“国共相克之情况就全般性而言并不显著，惟小部队之间却非常激烈。”^④ 朱瑞、陈光、罗荣桓在1943年1月28日给刘少奇并报中央的报告中写道：“1942年是摩擦较少的一年，过去反我最厉之地方友军正逐渐改变态度，主要原因是抗战形势有利我党我军疏通工作的推动。敌人压迫更甚，友军无以自保。”^⑤

那时，还有一个不能不重视的事实：山东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1941年春天，鲁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灾荒，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广大群众没有饭吃，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逃荒。没有外逃的群众，只能靠野菜、树叶和草根充饥。”^⑥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山东分局开展的“抗战第五年的山东十项建设运动”中提出“建立自给自足供给后方的经济建设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财政供给政策”等。罗荣桓叮嘱部下：“别忘了我们一一五师刚到鲁南吃黑豆、吃垛垛（是一种□成团的地瓜秧、烂梨掺和一点苞米面的摊饼）的艰难日子。要转告鲁南区党委，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要下力气组织他们生产。饿着肚子是不能坚持长期抗战的。”^⑦

1942年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方针后，山东战争工作推行会也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决定》，强调要“缩小编制，减少单位”。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归一一五师统一指挥。8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黎

① 《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印发〈接受鲁中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的通知》（1942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470、471页。

② 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60页。

③ 《毛泽东关于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给朱瑞等的电报》（1941年4月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167页。

④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906页。

⑤ 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60、61页。

⑥ 狄井芳：《忆鲁南三大事变》，《忆沂蒙》（上），第488页。

⑦ 陈沂：《像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回忆罗荣桓》，第421页。

王任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9月9日,山东分局又做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指出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非常不够。它要求:“(一)打破一切借口,无论如何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提出党政军民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百分之三(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二,党政民学不超过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某些山区或工作薄弱地区应少于这个比例。”“(二)精简的目的不简单在减少几个人员,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的工作,科学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三)精简政策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一切为了达到减轻人民的负担,储蓄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准备坚持长期斗争”。^①

山东纵队实行地方化和精简编制后大大提高了地方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理顺了部队的领导指挥体制,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主力连队和区县武装也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它也为下一步在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创造了条件。精兵简政还明显地有助于减轻政府开支和民众负担,有利于坚持长期抗战。这些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2年的山东工作中,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刘少奇到山东视察,提出必须大大加强群众工作,切实实行减租减息。

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军回延安时在3月上旬途经山东的,在山东共停留了4个月。他在这里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同山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多次谈话。他分析国内和山东的形势,鼓舞大家必胜的信念,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联合和斗争的关系,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着重谈了群众工作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过,山东工作的严重弱点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使群众运动的基础直到今日还薄弱得很”。^②

刘少奇直截了当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明确地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首先是由经济斗争逐步吸引人民群众转到政治斗争,改善了群众生活之后,再逐步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使他们参加政治工作,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抗战”。肖华写道:“我真正比较深刻地领会和掌握关于群众运动的方针、策略、方式、方法,是从这里开始的。”^③

刘少奇的讲话,在山东分局领导层中引起巨大震动。他们不仅完全接受这样尖锐的批评,并且下了决心,立刻坚决地付诸行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已养成的优良传统。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该决定一开始就写道:“分局总结了山东四年工作,着重指出由于山东全党同志上下忽视与轻视群众工作,不甚关心群众利益与改善群众生活,尤其对减租减息工作,没有引起全党一致的注意,这是造成山东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基本群众没有足够发动,影响到一切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陷于软弱无力,各种工作陷于停滞的基本原因。”“为了更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错误,克服脱离群众与孤立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并首先成为自麦收到年底这一时期的第一位工作。山东全党的领导及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今后均须围绕着并贯彻的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分局将以这一工作为今后检查各地工作的基本标准。对这一工作的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1942年9月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362、363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鲁苏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28页。

^③ 肖华:《艰苦岁月》,第38—41页。

任何轻视、忽视与敷衍,以后毫无成绩的地区,定受到严厉的责备”。^①

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中有着关键意义的重大转折。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但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实行,往往只强调合理负担而没有很好地抓减租减息。他们有的是忙于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而忽视这项有根本意义的工作,有的还担心这项工作如果处理不当会妨碍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后到山东工作的薛暮桥回忆道:“山东各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的认真进行,严格讲来直到1942年才开始。在这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进行。有的地区虽然在1940或1941年就实行二五减租,但其收获不大;后来环境恶化,就连这样所得到的一点小小收获也大多消失了。”^②山东如此,其他不少地方也是如此。

怎样实行减租减息?怎样发动群众来完成减租减息?山东分局在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制订出详细的补充规定。如:“要按原租额(未实行五一减租前的租额)减去租额百分之二十五,即四分之一。”“废除超经济剥削,如拉官工(无偿劳动)、送礼及地位不平等”。“战前债务,由政府布告所交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二倍者本利停付”。“抗战到息借条例颁布的日期已按分半减息者,约按分半计息”。“雇农工资应一律改为粮食工资制,其最低工资应逐渐达到三百斤粮食,平均工资应为四百五十斤”。“减租减息工作概由党委直接领导,各级党委须以主要力量做这一工作”。“在这些斗争和工作中,建立农民对农救会及积极分子的信仰,然后成立并加强农救会,作为发动减租减息运动的核心”。“在开始工作时,须切切实实了解当地群众的切身问题是什么,必须首先替群众解决这些切身问题,才容易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③

这些措施,切切实实地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解除或减轻了多年以来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的沉重负担,使他们真正感到共产党同他们是一条心的。减租减息的这种做法,又使农民看到了自身团结的力量。

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就这样在齐鲁大地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了。拿鲁中地区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决定和指示,从1942年5月下旬起开展这一运动,区党委决定以莒南、临沐两县为实施中心县,抽调两百多人组成工作组前往试点。进村后首先向群众广泛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和决心采取的措施。当群众发动起来后,工作组在群众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党支部、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民兵组织,民主选举了村长,在广大佃农中开展“谁养活谁”的教育,面向地主讲解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欢迎他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接受减租减息。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在全区各县推开。“到年底,鲁中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局共减租粮149372斤,减息粮25343斤、款15072.8元,增资粮505473斤、款4875元。减租减息的初步胜利,一方面,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对巩固鲁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

山东抗日根据地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①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1942年5月4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173—175页。

② 薛暮桥:《减租减息中的思想检讨》,《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③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补充指示(一)》(1942年5月4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176—179页。

④ 高克亭:《鲁中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回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521页。



说减租减息运动对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不是夸张之词。1942年12月山东分局宣传部转发的《接受鲁中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叙述日军对鲁中山区第二次“扫荡”的情况时写道:“群众对我党与民主政府的拥护,对干部的亲热,对伤病员的爱护,都是上次‘扫荡’所不能比拟的。在上年曾不断发生排斥工作人员、不愿同工作人员在一起、甚至有送礼的事件发生。今年不惟没有这些现象,而相反的大家见了工作人员都觉得有了依靠(这当然也因今年的干部与上年不同了,多数干部能领导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了)。”

它又讲到民兵的极大重要性:“在这次武装斗争中,我们特别巨大的收获,是群众对民兵的信仰的空前的提高与军民关系的良好。临蒙公路两边的游击小组把垛庄的敌人几乎完全封锁起来,公路附近村庄群众都说‘亏了民兵,不然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儿了。’他们曾经发起慰劳——豆腐、白菜,还有肉,民兵谢时,他们就说‘我们心里不安啊!’中心地区因为民兵掩护群众逃难,博得群众说:‘没有民兵,这次咱也跑不出来了。’类似的事情是很多的。”民兵是武装起来的农民,也是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后备军,民兵的态度和表现,也正是军民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体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深刻变化?它接着写道:“第一个原因,当然由于我们减租减息工作的成绩,由于我们基本群众在根据地已经初步发动起来,又由于在沂蒙区减租、增资、借粮等斗争政策掌握的还比较稳(当然也有过左的现象,过去已检讨),特别是还粮问题,在‘扫荡’前期已大部完成。因此各阶层情绪都很高涨,这是这次‘扫荡’群众情绪特别好的第一个基本原因。”“其中,减租增资后,在9、10月中马上转移工作中心为突击民兵和整理地方武装,以准备反‘扫荡’,因此民兵在沂蒙广泛的发动起来,民兵的教育与组织也有了初步基础,今年很少插枪逃跑,即使有的被围时插枪,但突围后即马上拿起来,而且始终情绪好,这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①请注意,这是70多年前留下的真实记录!

1942年过去了,山东敌我力量的消长日益明显。日本侵略军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认真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以后,这把钥匙打开了群众心里还存留的锁,一切都变样了,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山东抗日根据地已经从最困难的时期走了出来。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进入1943年,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五年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德、日、意法西斯势力从气势汹汹的进攻转为开始被迫退缩,他们的走向失败已成定局。如何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应对战后的新局势,成为放在人们面前需要及早考虑的头等重要任务。

在国内外局势如此迅猛发展面前,山东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性便十分突出出来。毛泽东总是看得很远。1942年7月,他就致电还在山东的刘少奇:“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

^① 《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印发〈接受鲁中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1942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474、476、480页。

的安全条件,实有须先计及之必要”。^①

那时日军驻山东的总兵力约4万人,山东伪军近17万人,居华北各省之首。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就达30万人左右。”叛军将领见到冈村宁次时往往对他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②他们继续频繁地对中国军队进行“扫荡”和“蚕食”。

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来看,尽管在这以前最困难的时期中,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部队减员四分之一,但深入观察,就会看到这些缩减只是一时的,许多具有决定意义、将要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却已悄悄地发生根本变化,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为什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1943年3月,北方局给山东分局的指示,对山东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根本变化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把它概括为四点:“(一)有相当强大的武装,这些武装基本上是统一的、团结的,而且和山东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是我党今后斗争坚持的一个重要保证。(二)民主政权的上层机构,县以上已经相当的普遍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制度已在开始创造,进步法令的颁布与初步的执行,已为多数民众所拥护,民主政权的威信在民众中开始有了相当的提高。(三)自中央土地政策颁布后发动基本群众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山东党的注意,并在若干地区(滨海、鲁南、沂南等地)收到了相当大的成绩,使广大基本群众对我党有了比以前进一步的认识和爱戴。(四)我党我军在五年来的艰苦斗争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对山东今后坚持是有意义的。”^③

当时,在山东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且把它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此时那样重要?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9月1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这令人想起解放战争快要胜利时,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道理正相类似。怎样实现“领导一元化”?该决定强调:“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④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这个决定规定的“一元化领导”,重点是放在党和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上,要实现党组织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这对各抗日根据地是同样适用的。而山东抗日根据地又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军队有着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这两大支,人数相近,有着各自的组织系统,虽然一直协同作战,却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这是其他根据地所没

^① 毛泽东:《关于掌握山东问题的指示》(1942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420页。

^② 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27、328页。

^③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山东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1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172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26、427、436页。

有的。

山东纵队是在山东土生土长地发展起来的。一一五师是 1939 年从山西省西南部的吕梁山区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东的。这年 5 月,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朱瑞统一指挥山东境内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军事行动,但没有将两支部队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它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历史原因:一一五师东进山东的部队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需要承担战略性的野战任务。毛泽东在 1938 年 2 月曾提出一一五师分三步向东进军的意见:第一步,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在河北敌后活动,“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第二步:如第一步有利,“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但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① 朱瑞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也说:“一一五师到了山东,受领的任务及最后任务,不是在山东建立根据地,受领的任务是准备参加大别山会战,一一五师受领的是大踏步的运动战的任务。”^②

可见中共中央对一一五师东进的最初设想,虽提到“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尽可能持久”,但只是把它看作过渡性的“第二步”,最后还是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这样,它同土生土长的山东纵队能够密切协同作战也就够了,没有考虑把这两支队伍统一编制的必要。

1939 年 4 月,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充分肯定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可能性:“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③ 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判断。对一一五师来说,也使它大举进入原定三步走的第二步成为可能。

陈光、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是在 1939 年 3 月 1 日渡过黄河故道进入山东省鄄城县境的。14 日,师部到达东平县境,同中共鲁西区委、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随后,经北方局同意,一一五师师部与中共鲁西区委联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陈光和中共鲁西区委书记张霖之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鲁西地区的斗争。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归第一一五师指挥。双方相处十分融洽,跨出了局部统一指挥的第一步。

6 月 25 日,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朱瑞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干部会议上报告,强调:“苏鲁皖边区当华北和华中的枢纽,是华北的第二支点,与太行山区同样重要;第一一五师要发展鲁西、鲁西南、皖北,山东纵队主要是巩固山东,相机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南发展。”^④ 可见在他心目中,这两支部队既要密切配合,在承担的任务上又有所分工。

这两支部队一时没有统一起来,还有着现实的原因:山东地域广阔,山纵所属部队最初大多在日军侵入时,就地建立起分散的抗日基地。日军又尽力用铁路、公路等交通线和众多碉堡、炮楼将这些抗日基地分割开来,交往不便。一一五师入鲁后最初主要在鲁西、鲁南一带活动,同山东纵队的不少抗日根据地相隔较远。长期的不同环境、不同经验,容易造成彼此间不同的作风、看法和人

① 《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1938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157、158 页。

② 《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 年 5 月 10 日)。

③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938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217 页。

④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 315 页。

脉关系,这是自然的,并不是出于某种排他性的宗派之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点时间才能做到水到渠成。

这种情况下,由于两支部队相互没有隶属关系,机关驻地分开,领导人有时对问题有不同看法,仍常会出现一些作战指挥不统一、相互协调不够好等问题,这在一段时间内是所难免,但终究是不利的。

到1943年,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领导人对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已逐步形成共识。彭雪枫、黄克诚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三、第四纵队在淮北、苏北地区取得巨大成功,八路军和新四军已胜利会师,不再需要一一五师继续南下。在并肩对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和“蚕食”的浴血奋战中,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将士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认识不断增长,已结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再加上交流干部和相互参观学习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已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刻。

这年2月25日,彭德怀等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对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提出具体意见: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军区(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归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军区机关。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意见:拟以黎玉为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委,罗荣桓为师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玉、罗荣桓、朱瑞为中共山东分局委员,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3月5日,彭德怀等复电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做出任命。随后,新的山东军区辖胶东、鲁中、鲁南、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分别由许世友、王建安、张光中、杨国夫、黄骅、陈士渠任司令员,由林浩、罗舜初、王麓水、景晓村、王倬如、符竹庭任(或兼任)政治委员。整编后,进一步实现了主力部队地方化、地方部队正规化。在干部的配备上,做到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山东军区精简整编和实行统一领导机构的工作基本完成。

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日致电北方局及华北各分局,决定朱瑞等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①这样,罗荣桓便正式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

新组成的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当时担任山东分局常委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回忆道:“1943年中,敌人对山东之‘扫荡’、‘蚕食’更加频繁,其目的在于巩固其过去‘扫荡’、‘蚕食’成果,企图继续压缩、分割、进而各个击破,最后摧毁我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內敌人对我津浦路以东各根据地进行的带战役性的‘扫荡’、‘蚕食’共约50次,计千人兵力者26次,二千人者7次,四千人者1次,五千人者3次,万人以上者2次,共使用兵力在16万人左右。按地区言,清河、鲁中最为紧张。以季节言,以春秋两季为主要进攻时间。”^②

1943年上半年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大批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军,包括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一一二师副师长荣子恒、第五区专员兼保安第四师师长刘景良等先后率部投敌,所部编成伪军。在此情况下,于学忠难以在山东立足,愤而不等蒋介石派遣入鲁的李仙洲部接防就率余部离开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抗日战史》写道:“我军事委员会基于事实,乃命鲁苏游击战区各军放弃鲁南、鲁北各根据地向皖北转移。迄是年(1943年)8月,国军逐陆续撤离鲁苏地区。战区总司令部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①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378、388页。

^② 肖华:《艰苦岁月》,第170页。

奉令撤销。”^①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的人力兵力毕竟有限,随着战争局面日益扩大,各方面都要应付,缺乏训练的新兵在部队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日本侵略军的力量用得快到尽头了。肖华说:“在敌人蚕食的过程中,又暴露了他不能克服的弱点,即兵力不足,前紧后松,前实后虚,蚕食方向此起彼落。敌人进攻时伪军留守,便于我乘虚打击。分散守备,使兵力更加分散,便于我军各个击破。一年来,我们反蚕食斗争攻打敌人据点,时常延长至三四日,敌人虽想增援,但兵力不大,要想集中兵力,又需相当时日,这就使敌人常常出于被动。”^②

这年3月间,蒋介石又派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部从皖北进入鲁西和鲁南,代替于学忠部。八路军向李部表示欢迎和慰问。李部反向八路军发动袭击,抢占战略要地。八路军被迫反击,李部只得撤回皖北。

沂蒙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原是国民党军队控制的主要阵地。吴化文等部降日后,日军力图占领这一地区。山东军区立刻展开争夺战,有效地取得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山东军区还广泛发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组织武工队到敌占区,打击敌伪军,并对伪军进行争取和瓦解。八路军内部,开展了整风学习,全面进行反攻准备。

日本侵略军这时已败象毕露,失却几年前那股气势汹汹的劲头。日方战史写道:“到了昭和十八年(1943年)精锐兵团逐次调往南方,由缺乏对中共作战经验之警备队接替。”“另一方面,中共之军事、行政、经济政策开始逐渐有了成果,‘解放区’之建设有了进展,更由于其拿手之游击战及地下工作,有如水流之渗透一般,在日军占领区内逐渐扩大势力。尤其原来在华北境内之中国中央军,在此一年之前几乎均归顺日军或被击溃,局部所形成之军事上三足鼎立(日军、中央军、中共党军)的局面崩溃,结果使得中共得到渔翁之利”。^③黎玉这样评论:“1943年日军虽然出动频繁,但从山东全局的情况看,战争形势已较前两年大为不同了。一方面是由于日军士气低落,作战盲目性大;另一方面我军在对敌作战中越战越勇,越战越精,敌人的‘扫荡’往往得不偿失。”“日军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改变政策,收缩兵力。此后,我军开始了主动进攻,而日军则基本上处于守势了。”^④

这年下半年还有一个插曲:国民党当局企图乘日军虚弱而控制山东。他们把于学忠部调离山东,又派黄埔一期的李仙洲部进入山东。李以一个师先入鲁南。八路军最初当李部同日军发生冲突时曾给予支持。李部却与收编的土匪刘桂堂(绰号刘黑七)部结合,攻占八路军驻地。八路军交涉无效,只能奋起自卫反击,阻滞李部入鲁。李部撤回皖北。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⑤

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变化,终于到来。

从1944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山东战场局势发展的特点,可以借用时任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的一句话来概括:“从局部反攻到大反攻。”^⑥

1944年最大的特点是:山东军区开始组织局部反攻,恢复与扩大根据地。这年春天,就制定了全年的作战总方针:在山东军区统一的战略指挥下,采取主要方向集中主力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

^① 《抗日战史》第13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编印,第128页。

^② 肖华:《艰苦岁月》,第175页。

^③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黄朝茂译:《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前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2页。

^④ 《黎玉回忆录》,第172页。

^⑤ 《罗荣桓传》,第299页。

^⑥ 《黎玉回忆录》,第181页。

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大量歼灭和瓦解数量众多的伪军,孤立日军,以达到扩大解放区、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的目的。6月15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上发表文章写道:“由于全山东各地区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坚持斗争的地位大大改善了。军事控制的地区一般恢复到1940年的局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支点,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缩短了,对敌斗争的自主权也增大了。”^①

1944年局部反攻对山东抗日斗争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重大的,而且是深刻的。范围几乎遍及山东全省各地区。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大部分地区都因部队抽走而采取守势。山东军区命令各军区根据各自情况,主动发动进攻。加上其他方面的因素,山东整个局势在这一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里还是引用黎玉的一段综合性概说来代替分散的细节记述:

仅1944年一年,山东解放区就扩大了4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近千万。伪军在这一年中反正的达140余股,约1200余人枪。山东八路军已经超过15万人,民兵共有37万,实力远远超过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加强党政军建设,从1943年山东党政军实现一元化领导后,各级机关、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山东分局统一领导下进行了整风审干、减租减息、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大生产、大练兵运动,使山东解放区更加巩固和强大。

减租减息运动,经过1943年的推动和1944年一年的努力,开始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有的县这一工作已扩大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地区已经进行查减村庄占所有村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有些地区甚至已达到百分之九十。查减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在封建势力压抑下沉闷了千年的中国农村活跃了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军民融成一体,人民真正感到了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1944年,沂蒙山区只十天半月的时间,就有1000人报名参军;1945年春节“拥军月”,山东全区有3万人参军,1944年2月至8月,仅渤海一个区报名参军的就达2万余人。

自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山东八路军、民兵积极投入了开荒运动,到1944年底,开荒面积据不完全统计即达34万余亩。为了丰产丰收,渤海区集中力量抓灭蝗蝻,这是一件功在华北的成绩。……工业生产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绩,纺织工业除鲁南刚恢复地区正在发展外,其余地区已经初步达到本区居民所需东西自足自给……由于这些发展,保证了战争军需,并改善了人民生活,彻底打破了敌人封锁,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②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兴奋的生气蓬勃的图景!

日军因主力南移,1944年春在山东只留有2.5万余人,是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而伪军增至20余万人,是全国伪军最多的地区,很大部分是国民党军在山东降敌组成的,士气涣散,已无心作战。宋清渭回忆道:“日本鬼子到了1944年底的时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强大压力下,已经明显感到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了。在各个战场兵力渐感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拼凑力量,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搜索性的‘扫荡’之后就草草收兵了,敌我双方没有

① 《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1944年6月15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22页。

② 《黎玉回忆录》,第182、183页。

展开大规模的战斗。到了 1945 年的春天,敌人进一步收缩了兵力。”^①

罗荣桓在《1944 年的过去和 1945 年的到来》一文中扼要地回顾了山东这几年来走过的路:“我们经过了 1941 年到 1942 年的艰苦斗争,保存了自己,坚强了自己;经过 1943 年我们从严重的三角斗争中,争取改善了自己的地位;1944 年,我们从坚持反对敌人‘蚕食’、‘分割’、‘封锁’中,开展了进攻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分散配备,使之被迫转变和采取了重点主义。”^②所谓“重点主义”就是指日本侵略者已只能重点守备剩下的几个孤立的点了。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出现令人震惊的豫湘桂大溃退的 1944 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全国产生相当引人注目的影响。

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的胜利中,山东处于突出的地位。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原总参谋长滕代远在 1944 年 9 月 27 日致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报中赞扬道:“半年来,(八路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③

日方军史在谈到 1944 年山东战场形势时也写道:“中共之潜在势力仍稳定地扩大,到秋季以后,亦开始对日本分驻队进行袭击。”^④

从 1944 年冬起,渤海、鲁南、胶东、鲁中等军区八路军相继发起攻势作战,解放了大片地区。其中,许世友指挥的胶东军区歼灭了总兵力达 1.8 万余人的山东最大的一股叛军赵保原部;鲁南军区击毙了投敌的伪第十军军长荣子恒,消灭了伪皇协军王洪九部。

1945 年 5 月,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 3 万人的兵力,以滨海、鲁中地区为重点,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山东军区立刻组织反击。经过 20 多天奋战,歼灭日伪军 5000 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山东沿海地区的企图,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但日军继续向山东增兵,增加到 10 万人,仍企图控制山东海岸线,防止盟军登陆。

根据新的形势,山东分局和军区下决心,集中兵力实施 5、6、7 三个月的夏季攻势,把攻势范围扩大到山东全区,还争取了伪军 1.5 万多人反正。经过 3 个月激战,进行了 10 多次较大战役,歼灭日军 300 余人、伪军 3 万余人,几个战略区连成了一片,还控制了大段的海岸线。

这三个月的反攻十分重要。罗荣桓曾评论道:“山东形势基本好转,但是形势的根本好转,还是在完成了 1945 年上半年的三个月作战计划以后。三个月作战计划主要是开辟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以打通和扩大渤海和胶东,以及他们同铁路以南的联系;再就是夺取临沂、费县,使胶济铁路以南的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地区联成一片,以便在大反攻时腾出手来向大城市进军。”“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较好的是胶东、渤海和鲁中,执行得不好的是滨海,他们对临沂、费县重视不够,没有把主力摆在临沂”。“我们经过了 5、6、7 三个月作战,基本上完成了预定计划,打通了几个战略区的联系,创造了最后反攻日军的有利阵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主动了,抽出了很大兵力参加大反攻。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我们就编成了 50 个团,这是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的结果。否则,大反攻来了,我们的兵力还没有集中起来,内地的敌占据点还没有肃清,那就被动了”。^⑤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11 日,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

① 宋渭渭:《岁月纪实》,解放军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 页。

② 《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1945 年 1 月 3 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 320、321 页。

③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 239 页。

④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 704 页。

⑤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 年 6 月 2 日、1960 年 12 月 12 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 585、586 页。

做出《关于调集干部确保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占领的紧急指示》。16日,山东军区将所属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共有正规军21万人,分五路实行大反攻。还有10万民兵和10万官兵随军配合行动。“至大反攻结束时,山东从陇海路以北(包括江苏一部分)、津浦路以东、北至河北省黄骅(燕山)、南皮、景县等地,除铁路沿线极窄的一条外,全部为山东解放区所辖,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约2800万人口。包括冀南、苏北部分地区在内,山东解放区完全辖制的县有65个(津浦路以西30多个县从1940年下半年划给冀鲁豫边区,未计在内),铁路沿线几个敌占城区内,亦有我地下党组织,置敌人于火山口上”。^①

山东《大众日报》在8月14日发表社论写道:“胜利并不是突然的。抗战一开始我们就坚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一天一天我们从苦斗中接近了这一个目标,今天的胜利,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努力奋斗的成果。”^②

终于盼到这一天的到来,而新的任务又立刻摆在人们面前。

抗战胜利不久,为了尽快解放东北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在10月至11月,山东军区所辖精锐主力8个师及其他部队共7万人,由罗荣桓率领,分两批开赴东北。留在山东的主力和基干武装还有20余万人,并迅速补充,扩大地方部队,组建新的正规军,投入下一时期的斗争。

几点认识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战后历史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罗荣桓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贡献是很大的,出兵总数在百万以上,现在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全国,有好几个军是从山东发展起来的。山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定地跟着党走,到抗日战争末期,山东是比较大的一块根据地,有一千几百万人口。所以对山东人民的功绩应有足够的评价。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华中的收缩阵地,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进行东北以及对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将是很困难的。”^③这个评论是富有历史眼光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的基本队伍在很长时间内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两部分力量组成的,分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这种状况在其他抗日根据地都不存在。它们共同浴血奋战,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特点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

山东纵队是抗战初期日军侵占平津后大举南下、进入山东,然后再迅速向南推进、造成后方空虚的情况下,由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以本省的地下党员、青年学生、贫苦农民和一部分由平津南下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在遍及全省各地发动起义而形成的抗日武装,它的优点是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较高的文化水平、熟悉山东各地的实际情况和风土人情,是山东人民的子弟兵,不足之处是最初还缺乏实际的政治锻炼,更缺少武装斗争所必需的军事知识。

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发展而来。他们经历过土地革命、五次反“围剿”、长征和抗战开始后进入山西对日作战的长期锻炼,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军事经验。不足之处是对山东情况最初了解不多和不少工农出身的指战员文化水平较低,兵源也有待补充。

① 《黎玉回忆录》,第186页。

② 《日寇无条件投降与我们的紧急任务》,《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5卷,第834页。

③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80页。

这两支队伍汇合在一起,恰好起着互补的作用。双方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山东徂徕山起义时,名称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正副司令员不是由本地干部担任,而是由黎玉主动到北方局请求调来的红军军事干部洪涛、赵杰担任。山东纵队成立前,黎玉又主动前往延安请示工作,并要求增派干部。中共中央决定派郭洪涛、张经武等 200 多人前往,以郭洪涛代替黎玉为山东省委书记,张经武为山东纵队指挥,江华任纵队政治部主任,黎玉改任纵队政委,主要领导职务大多由延安派来的干部担任。以后,中共中央派徐向前、朱瑞去山东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和山东纵队合署办公,没有发生过山东地方干部排斥外来干部的现象。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随着这两支部队在很长时间内生死与共地协同作战,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完全形成统一指挥,但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多,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融为一体,是很自然的。

中共中央和军委对这两支部队的相互关系一直十分重视。毛泽东在 1939 年 12 月给徐向前、朱瑞、黎玉、江华并告陈光、罗荣桓等的电报中对山东纵队作了很高的评价:“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他又在电报中要求这两支部队相互学习,并进行大规模的干部交流,写道:“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的干部很多,应当好好地教育这些干部,纠正其弱点,坚定其革命立场。我们提议山东纵队应当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拨给一一五师,而一一五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这对双方工作都有很大益处。”“与一一五师靠近的部队,可与一一五师建立联系,组织干部参观团,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一一五师对于拨二千五百人给山东纵队,应当郑重其事地组织。对所拨干部与战士,应当给以很好的教育与解说工作”。^①

这两支队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40 年 5 月 24 日,徐向前、朱瑞致电毛泽东等:山东纵队先后编入一一五师之武装约 1 万人。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经常组织指战员到邻近的一一五师参观和接受轮训。一一五师也经常派人到山东纵队去参观学习和帮助指导工作。8 月 9 日,朱瑞致电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便于应付新情况,前屡电建议山纵归一一五师建制,切实统一指挥与加强领导,应即刻实现。”^②

各方面的条件已日趋成熟。8 月 28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陈、罗并告彭、杨、黎玉:“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准备发展方向,因此极力加强山纵,提拔山东本地干部,使山纵正规化是你们的共同任务。”“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③明确“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这是一个重要决策,使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加快了步伐。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9 月 16 日,一一五师在费县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上对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用“争、插、挤、打、统、友”六个字概括了工作中的成绩。为了加强两支部队的团结,他还作了十分严格的自我批评:“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④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积极的,是为了达到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目的。会后,一一

^① 《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1939 年 12 月 6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500、501 页。

^②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 330 页。

^③ 《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1940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556、557 页。

^④ 《罗荣桓传》,第 230 页。

五师师部向北转移到沂蒙山区，同山东分局靠拢。

山东纵队的军事指挥人员，本来大多是从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调去的。两支队伍又经过大规模地交流干部和战士，开展相互学习的互动，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它们在党的领导下最终经过整编，实现一元化领导，就到了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的时刻了。这在那些当时常见的某些人把军队看作个人或某一派系私有的地方是难以想象的。

(三) 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反“扫荡”和反“摩擦”的军事斗争，而前者是主要的。这两种斗争的性质不同。正如毛泽东在1941年5月、也就是皖南事变刚发生四个月时所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①

当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使用将重点转向占领区后方，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扫荡”和“蚕食”，企图消灭一切抵抗力量。山东纵队也好，一一五师也好，军事斗争的重点都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这种“扫荡”和“蚕食”上。如果不通过一次又一次地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广泛游击战争，人民武装根本无法在敌后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了。

日本侵略军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优势，但它是非正义的而且手段残暴的战争，本身就起着激起广大民众起来反抗的强大动员作用。人力物力的不足和国际局势对它越来越不利。后来，它在山东已处在处处被动挨打的地位，只能控制一些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了。

反摩擦斗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只要你愿意合作抗日，都以合作的态度来对待，不希望发生为亲者痛、仇者快的摩擦活动，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但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的疑惧太深了，看到八路军在敌后抗日中得到发展，便觉得是对自己的严重威胁，总想限制以至消灭它。山东、苏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抗战初期在日军猛烈攻势下，大部分已经西撤，只有一小部分(如沈鸿烈、韩德勤部)来不及撤退，被切断在敌后，以后又收编了一些流散士兵和地主团练。他们在抗击日本侵略方面没有多少作为，却层出不穷地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残杀正在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将士。对这种从背后捅来的刀子，如果不加以有力的制止，同样也无法继续在敌后生存和发展抗日斗争。因此，八路军不能不严正地宣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有有效地制止这种暴行，才能维持团结，不致造成完全破裂。

进行反摩擦斗争需要十分慎重，本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原则，严格区别对待。在斗争中，又要尽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在山东，对范筑先、常恩多这样的爱国人士，共产党一直给以坚决而有力的支持。即便像石友三这样反复无常的军阀，当他一度表示愿意合作抗日时，同样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没有排斥和打击他，而当他同日本勾结时便坚决给予打击。对于学忠这样持中间态度的人，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态度，但对他提出的某些无理要求仍断然拒绝。后来，于学忠部被国民党当局调离山东。而对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八路军便坚决打击。秦启荣就是在勾结日本侵略军攻击抗日游击队时被击毙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成为伪军的，以山东为最多，如吴化文、荣子恒等。由于他们投降日本，为群众所唾弃，在山东始终不成气候。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在山东能控制的只有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的胶济铁路全线和津浦铁路南线附近狭长地带，其他广大地区都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这种格局是山东抗日战争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

(四)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生长、发展和成熟，是一个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过程。山东的地方干

^①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

部在这方面更缺少经验。许多问题是在摸索前进中逐渐弄明白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跨出新的步子。大体上，迈出过这样几步：一是组织武装部队，二是建立政权，三是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减租减息），四是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四步，并不是后一步代替了前一步，而是在前进中发现必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重要内容，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而成熟的建设大型根据地的做法。这几步，往往相互渗透和交错。

第一步，组织一支武装部队。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①因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初期主要工作在军事活动方面是很自然的。

从山东实际情况来看，这的确也是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的最好时机。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正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进入山东。韩复榘率 10 万大军不战而退。日军只是推进到鲁苏边境才遇到李宗仁率领的第五战区官兵顽强抵抗。他们有限的兵力正集中投入徐州会战，后方极为空虚。而八路军此刻刚从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作战，主力一时不可能来到山东。而山东也没有像南方不少省那样存在遗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这个首义的责任便落到山东省委身上。

几乎赤手空拳的山东省委没有错失这个有利时机。他们看到：山东民风刚直强悍，老百姓有强烈的爱国心，不愿做听人宰割的亡国奴，民间又有不少流散的枪支弹药，只要登高一呼，指明斗争的方向和办法，许多人是愿意跟着党起来投身抗日武装斗争的。山东省委毅然决定：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号召，在全省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且由省委直接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地区的徂徕山起义。

他们的办法是：“通过党员分工，对每个党员要求至少动员二至三人参加抗日游击队，有枪带枪，无枪借枪。每个党员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串联和发动。”“县委动员出来的大都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听说要上徂徕山拉队伍起义，他们带着土枪、大刀、红缨枪纷纷跟随我们上徂徕山。在农村动员出来的，真是子弟兵，不是兄弟、爷们，便是至亲近邻”。^②山东省委还向北方局请来几个红军干部，对他们进行突击军政训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并且对日军打了一个伏击战。

这样的队伍虽然简陋，但它是山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队伍，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夺取了先机。

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对他来到山东前省委领导的这场全省大起义这样评论：“抗战开始，山东没有我们八路军，但是地下党同人民结合发动起来相当普遍的人民的武装起义，这不仅是武装斗争，而且应该说是一个人民运动。这时群众运动是一个高潮，是山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潮。”^③

第二步，建立政权。当有了一支武装部队以后，就需要建立政权。这样，才能将当地群众和社会秩序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帮助群众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使部队的兵源、粮源、财源得到保障。

蒋介石历来对军权和政权这两件事抓得最紧。他在韩复榘被枪决后，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政

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23 页。

② 《黎玉回忆录》，第 121、124 页。

③ 《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 年 5 月 10 日)。

府主席。沈到山东后，就在八路军所驻地区任命了一批专员和县长。而山东党内也有些人认为沈鸿烈是“合法”的省政府主席，他所任命的专员、县长似乎也不便不承认，而对根据地民众自己选出的专员、县长反觉得有点不“合法”。徐向前回忆道：“山东的游击战争，虽然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政权建设工作，还没有跟上去，是个薄弱环节。就拿鲁中、鲁南来说，因为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能算个游击区，谈不上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花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政权在谁手里呢？在国民党手里。除了敌占区外，县长、区长、乡长都是国民党的人，听于学忠、沈鸿烈的，不听我们的。处处卡我们，不仅不供应八路军粮食、衣物等，还威胁群众，限制群众同八路军接触。他们作威作福，鱼肉乡民，苛捐杂税之多，令人咋舌。有的还与日寇、汉奸暗中勾结，干卖国勾当，袭击八路军。”^①这确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继续前进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华北各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态度鲜明地指出：“我抗战阵营中，又因鹿（钟麟）沈（鸿烈）之极端错误行动引起严重的摩擦与纠纷，使华北抗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摩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同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八路在三省扫荡伪政权，恢复中国政权，位于抗战之最前线，成绩卓著，功在国家”。“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粮。人民拥戴，踊跃输财。有利于国，无害于民。今后仍应如此，决不能枵腹作战”。^②那种一度出现的错误倾向得到纠正。

1940年8月，山东成立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职权，黎玉任首席组长，实际上行使省长职权。这样，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有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第三步，大大加强和改善群众工作。1942年刘少奇过山东时着重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强调了切实执行减租减息的工作。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一个重大进展。朱瑞在中共七大上就这个问题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回想到少奇同志说的发动群众的四个基本原则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群众自觉性。民主、民生不是不靠群众自觉而能够取得的。当时我们的武装打下了政权，才取得了民选方式。那时的民选，不是老百姓选举，而是党的活动分子选举。做了一点民生工作，叫‘五一’减租，也不是靠群众得来的，而是用法令达到的，不巩固的，极其狭小的，脆弱的，不是群众性的。”“另外还做了一些枝枝节节的工作，忘记了群众的肚子饿，要吃饭，只注意到群众头上要剪发，妇女包脚难看要放脚。青年工作搞起来了，就是搞运动会、野火晚会，提倡青年活泼、青年作风，而农民工作没有被强调。我们做过了这样一些工作，概括起来说，都是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形式主义的，是靠法令、条例，是靠军队打天下的方式，而真正发动群众自觉的起来斗争，是很少的”。^③他的自我批评是严格的，也是很深刻的，能给人以启示。山东的工作，在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后确实进一步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第四步，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这在胜利快要到来的关头更加重要。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1、64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各地摩擦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3、24页。

③ 《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10日）。

正如罗荣桓所说：“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实行一元化领导，首先要统一指挥。”^①所以，这项工作从1943年3月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就开始了。3月16日，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山东军区及一一五师各直属机关已实行合并办公，改为山东军区，并与分局合并，统一所有主力及地方武装之领导与指挥。对外保留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名义。”^②以后，随着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发展，内部的团结越来越紧密。到抗战胜利时，就很难区分哪支部队原来是什么，彼此已很难区别了。

至于山东省委和分局的主要领导人在八年抗战中有过几次调动。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做出重大贡献，解决了一些当时在发展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对加强团结十分重视。他们也有过各自的失误或不足，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的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③罗荣桓在谈到如何写山东抗日战争的历史时说：“抗日战争中山东哪些人犯错误，根本不必提名，但原则问题要谈清楚……我们根本不谈是不是路线问题，只写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就是了，至于犯错误的具体细节，谁说的、谁作的等等都不必写。”^④这不是为了宽容，更不是主张什么都模糊其词，而是因为这些都是前人在为革命而探索前进时，对一些复杂的新问题一时缺乏正确认识所造成的。应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要求前人对后人弄清楚的问题都早就弄得一清二楚。这样比较公道。

回顾八年抗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前人的业绩，而且也可以获得不少有益的启迪。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4页。

^② 《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关于师部、军区与分局合并向集总、军委的报告》（1943年3月1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176页。

^③ 《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④ 《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79页。